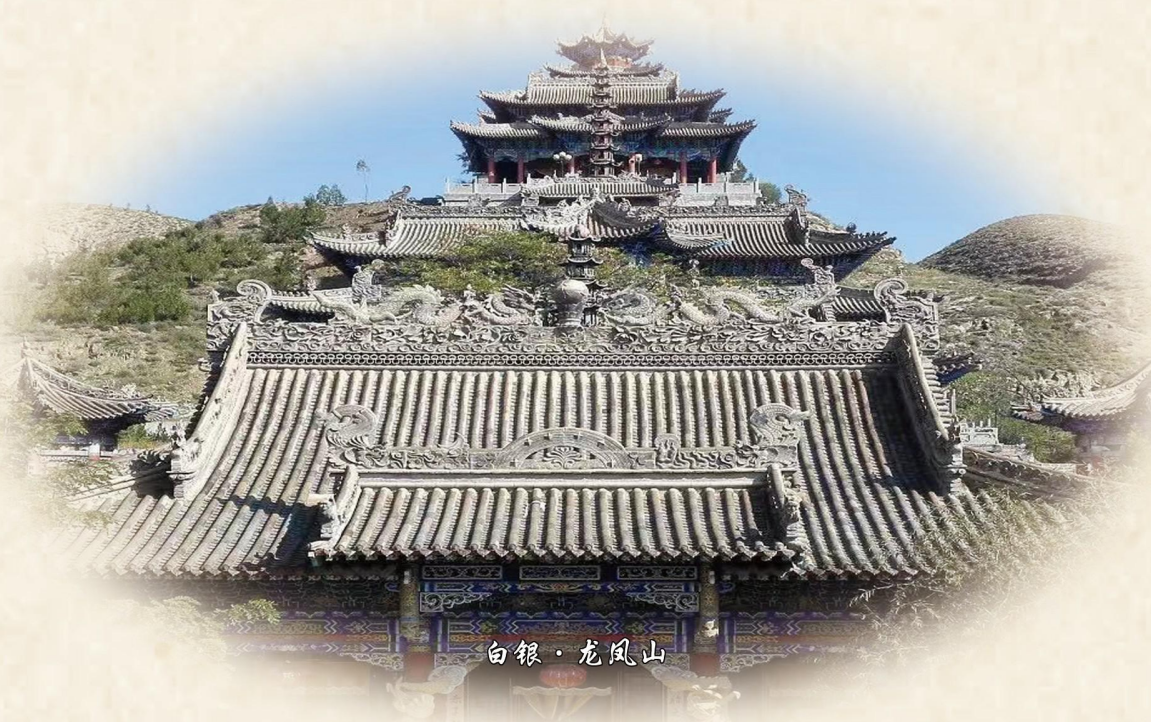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甘）LK000080号

甘肃史志

GANSU SHIZHI



白银·龙凤山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办
GANSU DIFANGZHI

2019·3

甘肃史志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 任：张军利

副主任：郝宗维 李振宇 徐大武 张正龙 石为怀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生 牛述林 毛兴东 朱克雄 李宽余

何成才 汪举红 张占社 张军平 陈 谦

罗文擘 郑天水 赵存福 贺红梅 高 中

高生军 梁兴明 彭晓峰 雷 丽 谭得胜

主 编：张正龙

副主编：张占社 牛建文

编 辑：王 华 李佳璐 蒋文涛 贾小炎

甘肃史志

2010年3月创刊 季刊 总第39期

2019·3

·特 载·

何伟同志在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 4 ·

· 史地考述 ·

汉河西四郡设置顺序及年代述论

华 丹 陈 谦 · 6 ·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地名研究述评

许若冰 · 18 ·

· 理论视野 ·

辛亥革命中的甘肃士人

陈尚敏 · 27 ·

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现状的创新性发展研探

任瑾洛 · 36 ·

· 人物春秋 ·

张维与《甘肃通志稿》

姜洪源 · 40 ·

清代乾隆年间两当知县秦武域述略

曹建国 · 43 ·

GANSU SHIZHI

· 文化传承 ·

庙学研究

——以两当县为例

张 辉 · 50 ·

对“文史互生”现象的探究

王长华 · 57 ·

· 史海钩沉 ·

平凉柳湖书院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朱克雄 · 65 ·

· 志鉴编研 ·

关于二轮志书评审的几点思考

邬 雄 · 72 ·

· 志鉴信息 ·

甘肃省志6部、市（州）志2部通过终审

· 35 ·

何伟同志在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摘要)

按：2019年9月6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何伟主持召开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对做好全省地方史志工作，确保全省实现“两全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现将何伟同志的讲话摘要刊登如下。

借这个机会，我就全省史志工作完成情况和今后的工作讲两点意见：

一、再接再厉，确保全面完成“两全目标”

“两全目标”（即：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编修任务，全面实现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发行）是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和省政府办公厅《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确定的总体目标。二轮志书编纂工作自2004年2月启动以来，虽然省地方史志办历届班子高度重视编纂工作，但前期编纂进度不是很快，直到2016年3月省地方史志办新班子到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工作进度非常快，在2019年第二季度

全国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和综合年鉴全覆盖完成情况的通报中，省志的排名由一年前的第18位跃升至第3位，市（州）志的排名由一年前的第11位跃升至第4位，县（市、区）志的排名由一年前的第18位跃升至第8位，编纂进度实现重大突破。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也实现了全覆盖，位列全国第一。今年编辑的2019卷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按照全省志书编纂和年鉴编辑攻坚年的目标要求，已完成终审，正交付出版社进行审核把关。

成绩是可喜的，但下一步我们要立足于已经完成的工作，丝毫不得松劲懈怠，在继续保持好当前成绩的同时，按照两全目标的要求，开展好下一步的工作。一是下功夫全

力抓好已经完成终审的志书修改完善出版发行工作。目前随着地方志“两全目标”在全省各地陆续完成，送交出版社的各类志书呈现“扎堆”现象。从目前出版发行的情况看，由于出版社在编校力量、书号发放审批等方面的客观条件制约，一些志书出版受到了影响，一方面省地方史志办一定要加强组织协调，另一方面各承编单位要抓紧修改，丝毫不能松气，确保按时完成出版，有必要的请省政府办公厅出函协调出版社做好优先排版工作。二是剩余还有8部已提交待终审的县级志书（《临夏县志》《广河县志》《积石山县志》《成县志》《武都区志》《卓尼县志》《宁县志》《张家川县志》），省地方史志办要加大督办力度，采取发督办函、发排序表提出要求等行之有效的措施，督促临夏、陇南、甘南、庆阳、天水5个市（州）党委、政府加强组织领导，承编单位加大工作力度，尽快完成志稿编纂并进行终审，确保10月底前全部完成终审任务。目前，临夏州志书编纂工作在全省还比较滞后，还有《临夏县志》《广河县志》《积石山县志》3部县志没有终审，特别是州地方志办公室表示《积石山县志》的终审工作今年可能完不成，这样是不行的，将拖全省后腿。临夏州要积极作为，把这本志书作为重点，采取集中攻坚的办法，保证该志10月底前完成终审。三是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要力争在今年10月底前全部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发行”。

总之，我们要乘势而上，一鼓作气，不

可有松口气的想法，在年底前志书终审全部完成，提前实现第一个全面任务，第二个全面任务基本完成，为明年全面完成“两全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从严把关，着力提高志书年鉴编纂质量

志鉴质量是地方志事业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价值所在。一是省地方史志办和有关部门、单位要切实把为党立言、为民立传的使命担当起来，把“质量第一”原则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始终；二是要严格编纂质量关和审核关，坚持志稿“一评三审”制度，每通过一个程序，质量就要提高一层；三是各级地方史志部门和有关部门、单位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不管志书是本单位自己编纂的，还是购买社会服务由第三方编纂的，各承编单位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推脱志书编纂的主体责任，都要始终把志书质量抓在手上，初评要把好第一道关，史志办在“三审”时不能降格，要请权威专家拔高质量，使我们编纂出的每一部志书都成为高质量的精品佳作、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官书”“信史”；四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正确把握志书编纂中涉及的政治、法规、民族、宗教方面的记述原则，对一些敏感事件、人物、术语、习俗等的表述一定要严格把关，确保规范记述，严谨准确，绝不能因志书记述的原因引起争议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和舆论事件。

汉河西四郡设置顺序及年代述论

华 丹 陈 谦

摘 要：关注两汉河西史，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四郡的设置年代。由于《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记载的歧异，及史、汉两书其它有关材料中隐含或透露的四郡设置年代的时间信息也不尽一致。随着居延、敦煌汉简的出土，河西四郡始置年代也逐渐清晰。元狩末年置酒泉郡、元鼎初年置武威郡、元鼎六年置张掖郡、后元元年置敦煌郡。至西汉末，在河西走廊地带最终形成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由西到东依次排列的格局。

关键词：西汉 河西四郡 始置年代

河西四郡，指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设置的四郡，即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行政范围大致包括今甘肃省西部的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酒泉市、嘉峪关市、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阿拉善盟一带。

河西四郡的设立是河西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开始。然而，关于四郡建置的先后顺序及具体年代，《汉书》不同篇章中却有截然不同、互相抵牾的记载。《汉书》卷6《武帝纪》载，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同《纪》载，元鼎六年（前111年）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奴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

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如是，则武威、酒泉于元狩二年（前121年）置郡，张掖、敦煌分置于元鼎六年（前111年）。

《汉书·地理志》载，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如是，则张掖、酒泉最先置郡，武威迟至太初四年（前101年），敦煌郡最后从酒泉郡分置。《汉书·食货志》又载，张掖、酒泉置于元鼎六年。此外，《史记》《汉书》中还有多处与以上记载相矛盾的史料。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汉

书》卷61《张骞传》载：“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三者基本一致，虽未明确四郡具体设置年代，但认为酒泉置郡最早，约在元鼎六年（前111年）“筑令居”左右，此后武威、张掖，敦煌皆由酒泉分置。

据现存文献，唐以前《汉书》注家均未对上引《武帝纪》《地理志》中的歧异之处表示过怀疑。直到北宋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这一局面方被打破。《资治通鉴》属编年体史书，要求编年叙事，因此司马光在确定河西四郡的始置年代时就不仅要对《武帝纪》《地理志》的歧异说法作出取舍，同时还要兼顾《史记》《汉书》中与此相矛盾的其它史料。对此，司马光为《资治通鉴》确定了“从《武纪》”的大原则。但在具体编年时，如果将武威、酒泉二郡的始置年代仍均系于元狩二年（前121年），与《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西使乌孙前所说的“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相矛盾。显然，“今单于新困于汉”是指匈奴单于元狩四年（前119年）被卫青、霍去病击败并被迫退出漠南后的境况，“故浑邪地空无人”则说明当时汉廷尚未在“故浑邪地”置郡。张骞此次西使的目的就是要招乌孙东还，并使其“居故浑邪之地”，以便共同对付匈奴。面对这一与《武帝纪》记载直接矛盾的史

料，司马光不得不将酒泉郡的始置年代下调至张骞西使乌孙返汉之年，并最终在《资治通鉴》卷19《汉纪》“元鼎二年”条下表述为“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又写道：“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究竟要“后”到何年，未明言。至于张掖、敦煌二郡，《资治通鉴》卷20《汉纪》则仍按照《武帝纪》的作法，在“元鼎六年”条下写作“分武威、酒泉地置”。此后一直到清代，虽仍有学者对河西四郡的始置年代有过论说，但他们或从《武帝纪》，或从《地理志》，或对二者的歧异强作调和，多未兼顾《史记》《汉书》中的其它有关史料。

从史学的观点看，只有充分利用《史记》《汉书》中的其它有关史料并合理解释《武帝纪》《地理志》所载河西四郡“开”“置”年代的矛盾，河西四郡始置年代的结论才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由此可见，司马光对武威、酒泉置郡年代所作的调整，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运用了以上所引《武帝纪》《地理志》以外的史料，为进一步深入探讨河西四郡的始置年代及相关问题打开了新的思路。20世纪40年代初，张维华从《史记》《武帝纪》《地理志》以外《汉书》的有关记载出发，综合考察了河西四郡的建置经过，得出“《汉书》武纪，地志的说法都存在问题”，并认为武帝时仅置有酒泉、张掖、敦煌三郡，武威置郡则在昭、宣时期。此后70年来，学术界大多赞成张维华的推断，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但张维华仅对河西四郡设

置的先后顺序做了推断，在时间上尚未在学术界形成共识。随着居延、敦煌汉简的出土，河西四郡始置年代也逐渐清晰起来。2013年，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炳泉就河西四郡设置的设置顺序及具体年代进行了详实论述，现综述如下。

关于酒泉郡的设置

在河西四郡中，古今学者多认为酒泉置郡最早。涉及到其置郡年代，除少数学者仍持《资治通鉴》所否定的元狩二年（前121年）说外，主要有元鼎二年（前115年）、元鼎六年（前111年）、元封三年（前108年）等说。元鼎二年说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此后，张维华、黄文弼等仍持此说，且其主要根据是《大宛列传》及《水经注》等有关记载。

《大宛列传》：自博望侯骞死后，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及汉使乌孙，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乃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计，皆曰：“必先纳聘，然后乃遣女。”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张骞西使乌孙返汉在元鼎二年（前115年），去世在元鼎三年（前114年），史有明文，最可信据。又据同传，张骞卒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

矣”。张骞卒后“岁余”当元鼎四、五年（前113年、前112年）。这说明，汉武帝已于元鼎四、五年初步实现了“通西北国”的目标。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始筑令居以西”与“初置酒泉郡”虽有前后顺序之不同，但都是为“通西北国”作准备，张骞西使乌孙则是汉武帝实现“通西北国”目标的具体措施。再联系《汉书·西域传》的相关记载（引文见后）看，“初置酒泉郡”当在张骞西使乌孙之前、“始筑令居以西”之后。至于张骞西使乌孙的启程年代，史无明文，据余太山研究，在元鼎元年（前116年）或二年（前115年）。因此，酒泉置郡必在元鼎二年（前115年）之前。据《水经注》卷2《河水》，“令居县，……汉武帝元鼎二年置”。陈梦家认为，此“似本之《地理志》，今本无此句”。古人注书，系根据现成资料以作疏说。北魏酈道元注《水经》时所能看到的《汉书》与今本应有不同，因此《水经注》的这条记载即使不是本之《地理志》，也必有其它古书为根据，可以信从。不过，黄文弼认为“酒泉之设置亦当在此时”，则稍显武断。其实，即使令居置县在元鼎二年（前115年），也不能证明酒泉置郡一定与其同在一年。以酒泉郡是河西四郡中最早设置的一个郡来看，其始置又必在令居置县的元鼎二年（前115年）之前。

《骠骑列传》：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浑邪王以众降”在元狩二年（前121年）。许多学者将“开河西酒泉之地”理解为置郡，因而

得出酒泉置郡在元狩二年（前121年）的结论。其实，上引“河西酒泉”既不能理解为“河西的酒泉郡”，也不能理解为“河西、酒泉二郡”，只能理解为“河西地区与酒泉郡”。也就是说，“开河西酒泉之地”实际上就是“开拓‘河西’和酒泉郡之地”。其中，“河西”是指临大河西的地带，而“酒泉之地”则指酒泉郡之地，也即“故匈奴昆邪王地”和“故匈奴休屠王地”。对此处之“河西”，我将另文详考，此不赘。陈梦家提出汉武帝在西北拓扩疆域“经过开地与置初郡的两个阶段”，并认为应将《史记》所述“元狩二年开酒泉之地”与酒泉“置初郡于元鼎六年”区分开。在此，陈梦家所说酒泉置郡的具体年代虽失之稍晚，但将“开地”和“置初郡”分开并以“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为根据推断出酒泉郡置于元狩二年（前121年）之后，则是可取的。

如前所说，武帝遣张骞西使乌孙是为了“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并与之共同对付匈奴。关于乌孙“故地”及其与河西走廊地区的关系，史籍记载并不一致。《大宛列传》载张骞西使乌孙前说“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又说“故浑邪地空无人”。以此为据，司马光认为酒泉置郡必在张骞西使带回乌孙拒绝东来信息的元鼎二年（前115年）。《汉书·张骞传》记张骞西使乌孙前所说的则是“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又说“昆莫地空”。如此来看，张骞想要招诱乌孙人来住的无人

空地就并非浑邪王故地，而是位于祁连、敦煌间的乌孙昆莫故地。余太山则又认为，“乌孙故地不在河西，而在今哈密一带。否则即使乌孙东返，亦难以起到断匈奴右臂之作用。质言之，乌孙是否东返，与置酒泉郡并无必然联系”。由此，司马光将酒泉置郡年代定为元鼎二年（前115年）也确有问题。

《匈奴列传》：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单于，匈奴退出漠南，《骠骑列传》述之于元狩四年（前119年）。“是后”即指“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之后。又从“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看，元狩四、五年（前119年、前118年）时“朔方以西至令居”一带就已开始“通渠”“置田官”了。这一绵延千里的地带既然已“往往通渠，置田官”，说明其屯田活动已全线展开。毫无疑问，这为酒泉置郡提供了保障基地。另外，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并迫使其退出漠南，又为酒泉置郡创造了较为安全的外部环境。从以上几个方面考虑，应将酒泉置郡之年定于元狩末年（前118年、前117年）。

综上所述，酒泉郡初置时的疆域在“故匈奴昆邪王地”和“故匈奴休屠王地”。《资治通鉴》所载“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

郡”与上引《武帝纪》一样，乃是省略的说法。而“故匈奴昆邪王地”和“故匈奴休屠王地”的位置，分别相当于《地理志》张掖、武威二郡之地。至于《地理志》酒泉郡“开”于太初元年（前104年）的记载，反映的则是酒泉郡疆域拓展至《地理志》张掖郡（即“故匈奴昆邪王地”）以西时的境况。

关于武威郡的设置

近世学者持武威郡置于昭宣时期之说者甚多。不过，此说与《汉书》中的多处记载相冲突。《汉书·西域传》：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二关焉。据此，酒泉郡最先设，武威与张掖、敦煌二郡一样也是由酒泉郡分置而来。又从“汉兴至于孝武”的时间断限和“四郡”的所指来看，武威置郡确在武帝时。又《地理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又《西域传》：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此两处之所叙虽因是概述而稍显笼统，但武帝“初置四郡”或“列四郡”的史实是十分清楚的。至于上引《武帝纪》“元鼎六

年”条所载“武威”，当如劳榦所说，“乃班氏以意增入或经后人窜入”。不过，即使如劳榦所说，也不能认为武威置郡在武帝之后。上引《地理志》《西域传》的记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外，《后汉书》载东汉人多称颂武帝“置四郡”之功，也说明武威郡置于武帝时。有学者以《汉书·韦玄成传》载哀帝时刘歆等人述武帝之功只言其“起敦煌、酒泉、张掖”三郡而未及武威，遂说武威郡不置于武帝时。其实，刘歆等人未提武威郡实是客观叙述，因为它于武帝时不当孔道。《史记》中未见“武威”，也属同理。又《匈奴传》载：元凤二年（前79年）“单于犁污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不少学者又据此认为，直到元凤二年（前79年）时武威还未置郡。其实，此处未提武威，同样也未提置郡已多年的敦煌。可见，用以上两条材料否定武帝置武威郡，也不能成立。以此类推，所有以简牍资料或其它传世文献来推断武威郡置于昭宣时期的作法均不可取。那么，武威置郡究竟在何年？在此，需对前引《武帝纪》中“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一语作些分析。若细审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是补叙“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的，所强调的是“以其地”，而非“以其时”。“将其众”中的“其”系指休屠王。“以其地”中的“其”则与《西域传》“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中的“其”一样，指的是浑邪、休屠二王；“其地”包括“故匈奴昆邪王地”

和“故匈奴休屠王地”。也就是说，“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反映的正是武威、酒泉二郡并置于浑邪、休屠二王“故地”时的实况。对比来看，酒泉置郡的年代早，《武帝纪》所云武威、酒泉二郡并置的年代则晚。换言之，酒泉置郡早于武威，且《骠骑列传》所说的“酒泉之地”就是浑邪、休屠二王“故地”。有学者对《武帝纪》“元狩二年”条之“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一语未作深入分析，遂误认为酒泉、武威二郡同置于元狩二年（前121年）。

其实，《资治通鉴》虽然没有明确武威置郡的具体年代，但已指出武威郡置于酒泉郡之后。又据《汉书·西域传》“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的记载看，武威置郡在张掖之前。还需要说明，武威郡初设之地当休屠泽以南之谷水流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资治通鉴》卷20《汉纪》“元鼎二年”条在记述酒泉郡“分置武威郡”后，紧接着写道：“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酒泉置郡后，疆域过于辽阔，势难有效切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在此背景下，汉廷在“绝匈奴与羌通之道”处置武威郡，乃自然之理。因此，可将武威郡的设置年代定在元鼎初年（前116年、前115年）。据《大宛列传》载，太初三年（前102年）“益发戍甲（田）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日比野丈夫对此解释说：“从北方沙漠地带向河西入侵的路线，大体上说西面是额济纳河，东面是白亭河（即西汉之谷水），与此

对应的防御中心则是酒泉和武威。《大宛传》载太初年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地理志》载居延是张掖郡的属县，位于额济纳河下游；休屠属武威郡，位于白亭河流域；两处都是都尉的驻地。这里没有提到武威郡，说明这一地区当时仍为张掖郡所属。”《汉书·李广利传》颜注引如淳曰：“立二县以卫边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卫酒泉。”据《匈奴列传》《武帝纪》，“置居延”即太初三年（前102年）时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或“筑居延泽上”。从以上所引材料看，“置二部都尉”的说法不妥，因为无论“筑居延”“筑居延泽上”还是“置居延”，都由路博德主持，而此时路博德的官职是强弩都尉，而非张掖郡所属之部都尉。就休屠来看，史书并未记载其筑城事，大概是因为原有休屠王旧城可资利用，不需要再行修筑之故。因此，此处的“置居延、休屠”当以如淳的“立二县”说为是。另外，日比野丈夫所引《大宛列传》那段话的断句也有问题，正确的断句当如前面所引，方为正确。其中，“戍甲卒”为“戍田卒”之误。“戍田卒”即“戍卒”和“田卒”之合称。其实，“益发戍田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主要是发卒在额济纳河下游地区屯戍，而“置居延、休屠”则是“立二县”，二者本不完全是同一回事。尽管如此，屯戍酒泉、张掖北和“置居延、休屠”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卫酒泉”。还需要说明，此时的酒泉、张掖二郡疆域的重心均已西移（详说见后），不

能再将“张掖北”对应“休屠”，并以此证明武威郡“这一地区当时仍为张掖郡所属”。又句中的“益”字说明，此前汉廷应有过“发戍田卒”至酒泉、张掖之事。此次“益发戍田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规模空前，其目的是通过屯田，有效开发张掖、酒泉二郡新拓展的地区，将其建设成为长期而稳固的联合西域诸国进而“断匈奴右臂”的保障基地。至于“置居延、休屠”则是为了巩固西北防线，防止匈奴从北方南下袭击，从而有效配合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的军事行动。

武威置郡初，其疆域当仅限于以武威县为中心的谷水流域。《地理志》载武威郡属县有武威，且武威郡一直在“故匈奴休屠王地”，可以为证。《地理志》载武威郡“武帝太初四年开”，正反映了武威郡疆域向东南拓展并兼有张掖郡东部疆域的事实。《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条云：“秋七月……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各二县，置金城郡”。又据《地理志》，张掖与金城二郡之间隔着武威郡。据此，张维华认为此时武威尚未置郡，因此时的张掖郡辖境已至大河，占有《地理志》武威郡之全境。其实，如果说始元六年（前81年）前张掖郡的东南疆域与陇西郡接壤可以无疑，但说它占有武威郡之全境则不妥。《地理志》首列姑臧县，仅说明武威郡于西汉末治姑臧，并不能说明武威置郡初的治所也在姑臧。对此，严耕望曾作专门辨析。他说：“《水经注·禹贡山水泽地所在篇》云：‘又东北径

武威县故城东，汉武帝太初四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置武威县，武威郡治。’据此，初置武威郡治武威县，是也。然不足以概哀、平之世。考武帝始置武威郡时，兼有《地志》张掖郡之地，其时武威县地当一郡中心，故为郡治，且以郡名命县。其分郡之西北部为张掖郡，武威县于武威郡已为西北毗，而姑臧既为郡之中心，且当通西域孔道，其为郡治之条件已远优于武威。且前汉武威郡之疆域变化甚大，而《地志》与《续志》之县城相差甚微，《续志》既治姑臧，吾人与其相信郡治之徙在班志版籍以后，不如信其徙治在班志之前也。又《地志》，休屠城，北部都尉治。其地在姑臧之北，而在武威县之南甚远，若郡治仍在武威，则北部都尉决不当治此，是西汉末郡治不在武威而在姑臧必矣。”此处，严耕望“武帝始置武威郡时，兼有《地志》张掖郡之地”和其后武威“分郡之西北部为张掖郡”的说法，明显有误。据《地理志》，张掖郡疆域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已拓展至“故匈奴昆邪王地”，其主体部分已不尽在“故匈奴休屠王地”。又据《地理志》以及前面所考，武威郡的疆域一直在“故匈奴休屠王地”。不过，严耕望“初置武威郡治武威县”和武威郡“西汉末郡治不在武威而在姑臧”的说法都是正确的。居延新简（53·63）提到元康二年（前64年）有“武威库令”，（58·29）又提到“武威郡姑臧别库”，说明至晚在元康二年（前64年）时武威郡的郡治尚在武威县，姑臧或仅为武威郡姑臧之县治，并非

郡治。也就是说，武威郡治从武威县移至姑臧县当在元康二年（前64年）之后。又《地理志》载张掖县属武威郡而不再属张掖郡，正是西汉末武威郡疆域占有张掖郡东部疆域的结果。所以，两汉的武威郡一直保留张掖的县名，且王莽还把武威郡称为“张掖”。《史记集解》注《匈奴列传》“令居”引《地理志》“张掖令居县”，居延汉简（119·67）有“小张掖”之名，《流沙坠简》杂事类第23简曰“武威郡张掖长□里”，也均可说明这一点。比较上引《昭帝纪》《地理志》的有关记载看，武威郡在东、张掖郡在西的疆域格局始于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年—前101年），中经昭宣，直到西汉末年才最终形成。

关于张掖郡的设置

关于张掖郡始置的年代，近世学者多持元鼎六年（前111年）说。与此不同，施之勉据《地理志》提出太初元年（前104年）说，日比野丈夫又提出元封年间由河西郡改名说。元鼎六年（前111年）说的主要根据是《平准书》“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一语及《武帝纪》“元鼎六年”条“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的记载。如前所说，上引《平准书》的资料仅说明张掖、酒泉二郡有过一个共存期。又由《地理志》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的记载看，其置郡又必在太初元年（前104年）之前（详说见后）。

《史记·李将军列传》：李陵……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数岁，天汉二年……《汉书·李陵传》的记载与之同，只是在“数岁，天汉二年”前还加了一段话：“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又以李广利伐大宛在太初元年（前104年）推断，李陵练兵酒泉、张掖当在此前“数年”的元封年间（前110年—105年）。说者以为李陵练兵时的酒泉、张掖是军事据点，不能将《李将军列传》中的“酒泉、张掖”理解为郡治或郡名。此实乃误读《李将军列传》且忽视《地理志》的有关记载所致。据前所考，酒泉郡置于元狩末年（前118年、前117年）。又据《地理志》，张掖郡疆域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时已向西拓展，酒泉郡疆域更移至张掖郡之西。这说明，李陵“教射酒泉、张掖”时，酒泉、张掖二郡的疆域只是未向西拓展，并不表明还未置郡。因此，元封年间李陵教射之“酒泉张掖”是指酒泉、张掖二郡。

《平准书》：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其明年”即元鼎五年

(前112年)。其中“初置张掖、酒泉郡”的年代,《史记集解》引徐广注曰“元鼎六年”。又,引文中的“西羌侵边”与《武帝纪》所载“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指的是同一事件。对此,《武帝纪》的记载最为详细而明确:元鼎五年(前112年),“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枹罕。……六年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如果再联系《西域传》“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及《武帝纪》元鼎六年(前111年)赵破奴出令居伐匈奴的记载来看,当如陈梦家所说,张掖置郡在元鼎六年(前111年)秋。这里还需将张掖郡的疆域及变化情况作进一步说明。张掖郡初置时,其疆域仅当张掖、令居二县为中心的地区。王宗维说:“汉始置张掖郡,治所一定在张掖县,如果不在张掖县,而在麟得县,就不会叫张掖郡,而称麟得郡了。”此说颇有道理。如前所说,《李将军列传》《平准书》将张掖、酒泉二郡并列,正反映了张掖置郡后与酒泉郡并存的实况。据《河渠书》,朔方、西河、酒泉等郡及“河西”大兴水利应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作《瓠子之歌》之后不久。而此时河西四郡中“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的仅有酒泉,说明酒泉郡疆域的东界距大河不远。这不仅进一步说明酒泉郡置于浑邪、休屠二王“故地”的说法可信,而且也说明直至元封年间(前110年—前105年)

张掖郡东部疆域(即张掖、令居二县为中心的区域)与武威郡的疆域还不相连。

《盐铁论·西域篇》: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盐铁会议召开于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盐铁之议既称武帝时已“建张掖以西”,又称能“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正反映了武帝时张掖郡的疆域向西拓展的情况。《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前81年)“以边塞辽远,取天水、陇西、张掖各二县,置金城郡”。张掖郡于始元六年(前81年)划出二县给金城置郡,说明其东南界已至河、湟一带,并与陇西郡接壤。综合以上两条史料,可见张掖置郡初的东南疆域就似已至河、湟一带并与陇西郡相连。

《武帝纪》云:太初三年(前102年)秋,匈奴“入张掖、酒泉杀都尉”。《匈奴列传》又称是年秋“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以上两处所载实为同年发生的同一次事件。至于前者记匈奴“入张掖、酒泉杀都尉”,后者记“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则是古书详略互见的通例。从其所述匈奴“入张掖、酒泉杀都尉”并“略数千人”看,酒泉、张掖二郡疆域的西移确实给匈奴南下袭扰提供了可乘之机。大概正是这个原因,武威郡的疆域才于太初四年(前101年)有所拓展,并兼有张掖郡疆域东部之部分地区。

《汉书·昭帝纪》云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居延汉简(甲1590):“谨案属丞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

百人为驛馬田官穿泾渠……”这两条材料可以互证，说明始元二年（前85年）时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驛馬田官的屯田已有一定规模，同时也说明此时张掖郡的疆域已拓展至西北居延南部地区。在此，需对太初年间酒泉、张掖、武威三郡疆域变动的情况作些说明。《地理志》载酒泉、张掖二郡“开”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威郡“开”于初四年（前101年）；张掖郡所“开”为“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威郡所“开”为“故匈奴休屠王地”，唯独未载酒泉郡所“开”为何地。细作分析可知，《地理志》所载三郡所“开”之年均非其初置之年，所“开”之地也均非其初置之地。事实上，《地理志》所言三郡之“开”是以西汉末的版籍为基准的。而相对于《武帝纪》所载三郡的初置而言，“开”的意思指的是在原有疆域基础上的拓展。况且，这样的理解与《说文·门部》“开，张也”的解释并不相悖。长期以来，学者不明“开”的真实含义且纠结于《武帝纪》关于四郡始置年代的含混记载及其与《地理志》的歧异，遂使酒泉、张掖、武威三郡始置与拓展的真正面貌隐而不彰。顺便说明，《地理志》载敦煌郡为“分酒泉郡置”而不曰“开”，正是为了说明其与酒泉、武威、张掖三郡的情况有所区别。

关于敦煌郡的设置

关于敦煌置郡的年代，近世除少数史家持元鼎六年（前111年）说外，多数史家认为在元鼎六年（前111年）之后。而在后一

种说法中，又以陈梦家所推定的元封四、五年（前107年、前106年）为最早，而以施之勉等人所持的后元元年（前88年）说年代最晚。

《武帝纪》“元鼎六年”条载“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也是敦煌置郡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的主要根据之一。不过，此条史料虽系敦煌、张掖置郡于“元鼎六年”条下，但并不能证明其与张掖郡一样同置于元鼎六年（前111年）。从道理上讲，酒泉郡疆域西移至张掖郡以西的年代既然在太初元年（前104年），其分置敦煌郡就必定在此年之后。因此，凡敦煌置郡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以前诸说均不能成立。《大宛列传》：（武帝）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是岁太初元年也。而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武帝纪》又载太初元年（前104年）“秋八月……蝗从东方飞至敦煌”。马雍认为，“此文虽未直接点出‘郡’字，但实指敦煌郡无疑。如当时尚未置敦煌郡，则其地仍属酒泉郡，此文当作‘蝗从东方飞至酒泉’”。其实，酒泉郡的疆域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刚移至“浑邪王故地”西，必不可能立即分置敦煌郡，此理甚明。因此，此处“敦煌”也不能像马氏理解的那样，简单地认为是指敦煌郡。据《大宛列传》载，太初二年（前103年）李广利首次伐宛失利，“还至敦煌”，武帝“使使遮玉门”“贰师恐，因留敦煌”。马雍又认为“太初二年（前103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

不利，还至敦煌。此敦煌亦指敦煌郡而言”。又据同传，李广利于太初三年（前102年）第二次伐大宛时，“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起敦煌西”，都以敦煌为汉军出发地。而《西域传》载征和三年（前90年）武帝诏书中却说“负食出玉门迎军”。以此来看，似征和年间玉门已取代敦煌成为汉朝西边的据点或要塞。不过，基于前面所说的道理，敦煌置郡于太初年间（前104年—前101年）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大宛列传》又云：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赂赐以镇抚之。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汉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始于太初元年（前104年），结束于太初四年（前101年）。伐宛的结果是，宛贵人杀宛王毋寡向汉军求和，汉军遂立昧蔡为新宛王。“岁余”，大宛发生内乱，宛贵人“乃相与杀昧蔡”，另立蝉封为宛王，并遣使“使赂赐以镇抚之”。其间，双方遣使的时间以半年计，则距太初四年（前101年）两年有余，即已到了天汉二、三年间（前99年、前98年）。就在此时，汉朝于“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据此认为：“它表明在天汉二、三年间，汉朝政府在敦煌新设了‘酒泉都尉’，即该

都尉属酒泉郡管辖，则敦煌在天汉二、三年间尚未建郡”。《汉书·刘屈氂传》：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死。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此条材料是说征和二年（前91年）“巫蛊之祸”时武帝对涉戾太子案人员及趁乱劫略的吏士予以惩处之事。刘光华说：“它可能是征和二年以后的事，因为当时与戾太子案牵涉的人不会太少，对这些人的审理当有一个过程，即所谓‘上连年治太子狱’（《汉书·田千秋传》）。所以上引资料乃是史家追书，班固把它排于征和二年（前91年）秋天，容或有误，并不能否定后元元年（前88年）说。”此说有理。也就是说，凭以上所引《汉书·刘屈氂传》的材料也不能否定敦煌置郡于后元元年（前88年）说。《西域传》又载武帝置轮台屯田的诏书上叙述征和三年（前90年）征伐车师之事：“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这一诏书是对征和四年（前89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上奏的批复，奏文“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中有张掖、酒泉二郡名而无敦煌郡名。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云：“明年始置敦煌郡，故第言酒泉。”据此，施之勉认为征和四年（前89年）敦煌尚未置郡，次年（前88年）由酒泉分置而成。看来，徐、施二人的看法均与《地理志》的记载一致，敦煌郡置于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敦煌石室所出《沙州都督府图经》引《汉书》云：“武帝元鼎六年，

将军赵破奴出令居，析酒泉置敦煌郡。”有学者认为，这一记载比今本《武帝纪》元鼎六年（前111年）“秋……乃分武威、酒泉之地置张掖、敦煌郡”的记载“更为直接明确，可以为据”，从而认定“敦煌郡置于元鼎六年”。其实，《沙州都督府图经》所引《汉书》的材料与今本《汉书》并无二致，只不过《沙州都督府图经》作者据己意对《汉书》作了改写。因此，据此只能证明敦煌郡乃由酒泉郡分置，却仍不能证明酒泉置郡在元鼎六年（前111年）。从以上考证可见，《武帝纪》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与《地理志》“敦煌郡，后元年分酒泉郡置”的记载并不矛盾，均可信从。之所以产生分歧，原因在于古今多数学者对《武帝纪》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作了机械的理解。如果将《地理志》中的酒泉、张掖、武威“开”郡理解成在原有疆域基础上的拓展，将敦煌置郡仅仅理解为由酒泉郡疆域中分出，则不仅可以确定敦煌置郡的具体年代，而且酒泉、张掖、武威三郡始置与拓疆的年代也可藉此得到较好的解决。换言之，《地理志》的记载应予肯定，敦煌

郡置于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的说法也是正确的。

综张维华及李炳泉关于河西四郡设置顺序及时间的论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 汉河西四郡的设立先后顺序应为：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

2. 西汉政府因“通西北国”和“隔断羌胡”的需要，于元狩末年（前118年、前117年）在浑邪、休屠二王“故地”置酒泉郡。

3. 元鼎初年（前116年、前115年），为了“绝匈奴与羌通之道”，分酒泉郡东部（即“故匈奴休屠王地”）以武威县为中心一带置武威郡。

4. 元鼎六年（前111年），分酒泉郡东部以张掖、令居二县为中心一带置张掖郡，以进一步控制西羌。

5. 后元元年（前88年），分酒泉郡西部置敦煌郡。

至西汉末，在河西走廊地带最终形成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由西到东依次排列的格局。

（作者单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地名研究述评^①

许若冰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们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地名普查与标准化工作，纷纷聚焦于甘肃省各县市地名研究，继承古代沿革地理注重对古地名考证的研究传统，并注意挖掘地名蕴含的区域文化内涵，丰富了地名研究的面相，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今后的甘肃地名研究应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地名信息系统”服务于学术与社会，同时将地名置于整体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注意挖掘地名及地名变迁所反映的区域社会人群关系，进一步推动甘肃地名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关键词：甘肃 地名文化 研究述评

地名是基于地理空间、行政区划所表现出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真实的反映了历史时期地域社会的地理环境、社会宗教、语言文化以及族群互动关系，并构成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表征。因而，地名研究成为我们探寻区域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把钥匙。中国传统的地名研究属于历史沿革地理研究范畴，注重利用文献史料对古地名进行考证。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性的地名普查与地名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促使历史地理学者们在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地名学理论^②，史念海、陈桥驿、邹逸麟、史为乐、周振鹤、华林甫等学者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地名学的定义、研究内容与方法的论著，

诸多全国性的地名材料相继出版^③。伴随着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活动，各省市的地名研究工作逐步启动，甘肃省的地名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经过40多年的发展，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一直缺乏对研究现状的总结与反思。有鉴于此，本文对当前甘肃省地名研究现状进行爬疏与思考，以期有益于当前该领域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

一、甘肃地名研究的历史分期

改革开放以来的甘肃地名研究主要经历了两大时期，其学术历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即20世纪80到90年代在甘肃各级政府地名普查工作的指导下进行地名材料的

整理与编著工作，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始于当时甘肃学界响应政府部门的号召积极对本区域内古地名进行考证研究；进入21世纪，伴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甘肃地名研究也发生文化转向，学者们更加注重对地名文化内涵的发掘与研究。

甘肃地区的地名研究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地名普查工作，同时形成了一批专门的地名材料与地名志。1979年—1980年，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号召下，甘肃各地开展对境内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的普查与地名标准化处理工作，具体由各县级人民政府主持进行以区县为单位的地名调查并汇编地名材料。1983年，兰州市安宁区、城关区、白银区相继编写完成《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地名资料汇编》《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地名资料汇编》《甘肃省兰州市白银区地名资料汇编》；同年，甘肃华亭县地名普查办公室编写了《甘肃华亭县地名资料汇编》全面梳理了该县的行政区划居民地、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文物古迹等地名信息。1985年，会宁县人民政府主编的《甘肃省会宁县地名资料汇编》中收录会宁地名4642条，详细介绍了县属各公社、林场、古迹、工厂等名称。以上资料均属内部材料，另外还有其他各县地名普查资料尚未公开。直到90年代后，有关甘肃地名的材料逐渐公开出版，如1995年甘肃省编纂委员会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省》以及随后兰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兰州市志·建置区划

志》^④，详细记述了秦代至建国后兰州地区的行政沿革与建置区划等地名信息。

通过上述地名材料可以发现，20世纪80到90年代的地名研究尚处在官方主导下对地名信息的采集与辨识阶段，相关成果主要为政府部门开展基层工作服务，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由于地名调查研究起步晚，相关研究停留在宏观的地名汇总层面，尚不足以形成学术性成果。但这些地名资料汇编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力推动了地名研究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各类方志、游记文集等文献，如《秦边纪略》《甘肃通志》《西北行记丛萃》等材料对甘肃地名也略有提及，同时期的王仁康、刘满、薛方昱、王宗元、王昱等学者，也在积极利用上述文献材料并兼顾田野调查方法，对甘肃古地名进行细致的考证研究，基本理清了甘肃各地区重要地名的历史源流与演变关系，丰富了区域社会的研究成果。

21世纪以来的地名研究不断走向纵深，学术路径亦发生转向，学者们在延续地名考证研究的同时，更加关注对地名文化内涵的探索与发掘。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地名考证研究由大型城址转向更加微小细致的文化遗址研究，同时，对地名文化的讨论成为这一时期新的学术潮流。令人可喜的是，少数学者已经开始利用人类学、地理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对地名信息进行深度分析，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必须承认的是，21世纪以来的地名研究也存在较大的研究瓶颈，如学界对甘肃地名的关注度与研究力度大不如

前,出现研究乏力、视野有限、成果稀少等窘境,这些问题亟待学者们进一步解决。

二、甘肃地名研究的学术成果

甘肃地名研究在经历了地名材料的长期积累后,相关学术成果大量涌现。如前所述,众多学者利用文献材料与田野调查方法对甘肃古地名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新时期以来学者们积极扩宽地名研究的内容,逐步转向对区域地名文化资源的挖掘,将地名研究推向纵深。

1. 关于甘肃古地名的考证研究

20世纪80到90年代的甘肃地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古地名的考证。学者们首先针对两汉时期金城郡治所允吾城的地理位置展开争论,同时探讨历史时期令居县、金城县、榆中县以及相关河流的地理方位。

第一,对两汉金城郡治所允吾县城址的考证。1978年,王仁康发表的《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考证出金城郡治所允吾县在湟水南岸并紧靠郑伯津,^⑤即今大通河以东、庄浪以西甘肃境内湟水入黄河附近的永靖县北。刘满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允吾县在青海民和县下川口附近,而郑伯津认为在今下川口北的湟水边上^⑥。随后,王仁康对刘满的看法提出批驳,并补充了允吾在永靖县北的观点。对于以上学者的讨论,张大可通过实地调查,认为上、下川口以及之间的马集垣具有设置城邑的条件,张文轩与蔺子武也认为允吾城在下川口^⑦。此后,薛方昱也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汉代金城郡治所允吾县在今湟水和黄河之间的民和县北古城^⑧。陈

守忠则通过文献考证与实地勘察提出允吾城在今永靖县盐锅峡乡黄河北岸方台上的古城遗址^⑨。经过多年的争论,学界对允吾县在民和县下川口地区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

第二,对汉代令居县及逆水、涧水地理位置的考证。主要有薛方昱的连城水磨沟说^⑩、王宗维的咸水河中游说^⑪、赵鹏翥的永登县城西北说^⑫与向红伟的永登县城说^⑬等观点。通过精读这些学者的文章,我们发现学者们对令居县的定位分歧主要是由于对涧水的考证差异,薛方昱认为涧水为大通河;王宗维认为涧水为咸水河;向红伟认为涧水为庄浪河,逆水指咸水河;王宗元指出《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错误地将乌亭逆水和涧水当成湟水的支流,考古遗迹证明逆水和涧水是对今庄浪河不同河段的称谓,他认为汉代令居城在庄浪河东岸的永登县^⑭。另外,王昱与崔永红对令居塞的设置时间进行了考辨,认为令居塞是在元鼎六年(前111年)由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所建^⑮,对以往学者们认为令居塞是元狩二年(前121年)由霍去病建造的观点提出批驳。

第三,对历史时期金城县与子城县的地名关系、榆中县地名沿革的考证。如刘国元、吕叔桐认为隋朝金城郡的治所为西魏北周时的子城县,地点在榆中王家崖附近;同时,隋朝在今兰州城区设五泉县作为金城郡的辖县,唐朝兰州府的治所是将隋朝的子城迁徙到五泉县,并在贞观年间改名为金城县^⑯。娄昉则对这种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北周子城与金城郡无关,应属临洮府,随后迁

到今兰州城关区作为金城郡治，此后一直延续^{①7}。对此，刘满认为汉代金城县一直在今兰州市城关，否认金城县在后来由西固城迁到兰州城关的说法^{①8}。我们看到，围绕金城县与子城县地名关系的讨论限于材料不足，学者们众说纷纭。另外，吕叔桐、杨永发等学者针对榆中县地名进行考证，吕叔桐、牛丽红的《古代榆中考》梳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榆中县的地理沿革，认为汉代的榆中不在今榆中县内，而在东岗镇附近，今榆中县是由金代的金州沿袭而来^{①9}。杨永发、侯桂秀则根据《水经注》《寰宇通志》等文献对榆中县址的不同记载，提出榆中县两迁说^{②0}，他们认为榆中故城在大通河下游（今兰州西），曾一度内迁至现位置（今兰州东南），民国时以“榆中”为金县命名，榆中城又回到现在的位置。当然，随着考古发掘与出土材料的增多，相关讨论仍然有待进一步进行。同时，应当指出的是，上述讨论对于我们理清甘肃各县的名称来源及其演变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第四，对山川河流、故址遗迹、交通线路、卫所堡寨、关津等地名的考证。20世纪90年代，薛方昱连续发表数篇关于甘肃地名研究的文章^{②1}。如《陇山源名考》考证出陇山本意为龙山，源于古羌语“朝那”；对邽县中的上邽的设置、地理位置及其与清水等地的关系进行详细研究；从历代秦安县的建置演变中，认为北宋设安夷镇，金初设秦寨，金正隆二年（1157年）分别取秦寨与安夷镇首字，设秦安县并沿用至今；在《街亭

故址考辨》一文，考证出三国时期著名的街亭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二十五华里的恭门乡上城子。

进入21世纪以来，各类小型的历史文化遗址地名更加引起学者们的广泛讨论。如李济阻与蔡副全两位学者关注杜甫诗句中的甘肃地名。李济阻对杜甫的《秦州杂诗二十首》中提到的南郭寺、东柯谷、陇坂、隗嚣宫进行考辨，基本理清了这些地名的方位；蔡副全考证了杜甫《发秦州》诗中的“汉源”是在乾元元年（758年）由“上录（禄）改名汉源”，在今甘肃西和县境内，并指出泥功山北麓是杜甫由秦州南入同谷的必经之路^{②2}。刘满关注到秦皇、汉武帝西巡的路线，考证出秦皇、汉武帝登临的空同、鸡头实为一山，即今六盘山的主脉大关山，鸡头道是由今宁夏泾源县香水河谷翻越大关山到陇山以西的道路^{②3}。值得一提的是，李得贤梳理了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西巡的路线，并对其经过的临津关、拔延山、长宁川、金山、星岭与覆袁川等地名进行考证^{②4}。这些历史遗迹的考证研究对当前地方政府进行区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如南郭寺、泥功山、鸡头山、临津关等遗址已经成为著名的景区与地方文化名片。

邓明、妥超群、王蕾等学者则关注甘肃地区军事堡寨、关津与卫所等地名。邓明具体介绍了兰州各城堡的名称与形制演变及其战略地位^{②5}。妥超群与刘铁程通过对青藏高原地点命名规律以及对史料的重新解读，考证出毕力术江应是青海湖布哈河，修正了吴

均等学者所持毕力术江为通天河的观点，初步确定曲先卫地望及相关地名的位置^{②6}。王蕾从军事防御角度认为北周将金城郡治迁至汉代的金城县（今兰州城关）引发了区域政治军事中心的东迁，并促使隋代设立的金城关成为通往凉州、临州、河州等地最重要的交通枢纽^{②7}。这种学术关照有助于将地名研究引入更加宏观但不失深刻的思考。

2. 甘肃地名与地域文化研究

地域文化研究是当前的学术热点之一。地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地域人文观念最直接的表达，有学者就尝试透过地名观察区域文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如于小秦通过总结甘肃县名的命名规律与特点，认为甘肃县名表现出边地文化、生态文化、绿洲文化、山地文化及民族文化等综合性特征^{②8}。白晓霞则进一步将注意力放在甘肃地名的传说故事，她认为地名传说不仅可以解释语义，而且表达了民众对地方社会文化的共建与共享^{②9}。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古城遗址名称、山水名称与村落名称的各类传说都具有类型化的特征并承载了鲜活饱满的民间心理。

兰州是甘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人群活动密集，各类地名丰富，备受学者关注。早在1986年，赵世英就根据兰州地名的来源、含义及其新生名称，将兰州地名的命名方式分为山水形态、人群姓氏、历史人物典故、美好愿望、与城中距离、名胜古迹、商业市场等九类，并梳理了兰州地名的历史沿革演变^{③0}。兰芳进一步细化到对兰

州市区街道地名沿革的考察^{③1}。梁贵仓根据兰州的地名特征及其演变过程，提出兰州地名具有边塞文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民族文化等四大特征。张建军分析了兰州地名的命名方式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心理特征^{③2}。另外，文博聚焦于武山县的地名语言文化，运用文献考证、语言信息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武山县地名的命名、含义、分类、演变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独特的地理环境^{③3}。值得注意的是，崔明借鉴人类学视角对“庄浪”一词的形成进行探讨，他认为庄浪，一是今兰州市永登县的旧称，二是指今平凉市庄浪县。这两处地名的来历不太可能是北方庄郎族或积石地区庄浪族迁移的结果，而可能与唐天宝年间吐蕃文化的侵入有关^{③4}。作者尝试在地方性知识认知转变的视角下理解地名，为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另外，薛方昱与乔高才让还对甘肃诸多羌语地名进行探讨，提出“兰州”一词源于古羌语“皋兰”，意为石羊出没的山路，庄浪为地名野牛沟，古浪为地名黄羊沟，乌支、月支等均为古羌戎部族名^{③5}。如前所述，这些来源复杂的民族语地名暗含着区域族群关系的某些侧面，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甘肃区域人群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近年来，张鹏丽与李育使用ASTER30米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提取了兰州市周边所有的地名信息，通过地名与地貌分析，发现兰州地名命名及分布基本可以反映兰州市的地形地貌，指出兰州地名类型的分布随

高程呈现出一定规律^⑧。作者运用地理信息技术,以兰州市为例对我国地名命名和地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王宗元等学者也都有文章对甘肃地域地名进行了探讨^⑨。

三、甘肃地名研究的几点思考

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的甘肃地名研究,其历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内容在延续了古代政区沿革地理研究的传统中加强了对地名与区域文化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应当指出的是,当前地名研究仍然存在理论方法单一、学术视野有限、研究深度不足等问题,且至今没有形成一本专门探讨甘肃地名的学术专著。现就如何进一步开展甘肃地名研究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建立区域地名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学术体系。这也是当前中国地名学研究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之一。通过梳理从事甘肃地名研究者的学术履历,我们看到学者们往往是根据自己学科,从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地理学的研究角度进行地名研究,相关研究方法与理论也都属于其他学科,区域地名研究尚未形成独立系统的学科体系与理论方法,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甘肃地名研究的发展。未来的地名研究如何在与其他学科的借鉴与交流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理论与方法?如何在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基础上探寻现代中国区域地名研究的学术体系?这些课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掌握民族语言的同时,注重现代地理科学新技术的应用。甘肃地区存在丰富的民族语地名,从事地名研究

的学者应当具备藏语、蒙古语、吐谷浑语等语言学知识,同时继续借鉴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对各类地名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考察,丰富地名研究的面相。与此同时,地理科学技术是当前地名研究的潮流与趋势,这恰恰也是当前甘肃地名研究最为缺乏的,相关研究仅有张鹏丽与李育基于数字高程模型对兰州城市地貌与地名相关性的分析。呼吁地理学、测绘学、计算机学等领域的学者加入到地名研究的行列中,借助本学科技术优势,运用EOF模型、空间分析、图层叠加与对比、地名与各要素的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地名研究,拓宽甘肃地名研究的领域与视野。

第三,在整体史视角下进行甘肃地名研究,注意挖掘地名及地名变迁所蕴含的社会因素。地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断受到区域地理条件、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土民情等因素的影响。甘肃地名的产生与演变与各少数民族的互动与交往关系密切。当前的地名研究过于注重对地名概念本身的静态考察,忽视了地名以及引发地名变迁背后的各类社会文化因素。今后的研究应当在甘肃区域社会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考察地名的意义,注重地名与区域环境变迁、族群互动、经济发展、宗教活动、移民军屯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将地名与区域社会有机的联系起来,并尝试为今后西北区域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把甘肃地名打造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进而推动甘肃区域地名乃至中国地名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第四，建设“地名信息系统”，增强地名的应用性，服务于学术与社会。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得以将繁杂的地名信息数字化，政府部门应当联合科研单位并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建设“地名信息系统”，按照时间脉络将甘肃区域地名与区域地图进行有机对接，同时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展现历史时期甘肃区域地名数量与密度的增减、地名分布的变迁趋势以及影响地名的各类因素等内容。这些地名信息数据库，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区域民族史、区域社会史、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以弥补传统文献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开发甘肃地名公共服务系统，方便民众检索与查询，让地名研究真正为方便民众生活、实现社会发展而服务，充分体现地名研究的公益特征与社会价值。

第五，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发掘并弘扬区域社会文化。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甘肃众多的老城区面临转型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部分城市街区命名也趋于现代化，许多蕴涵丰富历史信息、见证城市发展进程的老地名趋于消失。因此，应当保护并传承甘肃区域的老地名，充分挖掘地名文化资源，张敦田与袁斗成相继在《兰州日报》上呼吁保护兰州老地名，留住地名文化，在新街区命名中也体现出地名文化内涵，让老地名成为兰州的文化名片。另外，地名是地方性知识的集中展现，甘肃区域保留的民族语地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应当充分挖掘民族语地名的文化内涵，揭示其命名方式、特点与规律。

总之，探索并弘扬地名文化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学术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与思考。

注释：

①本文根据拙文《改革开放以来甘青地名研究述评》修改而成，原文发表于《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3期。

②陈雄：《论地名学研究》（《中国地名》1999年第2期）就认为，地名学是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但这种说法混淆了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研究的概念。历史地理学、沿革地理研究、地名学三者关系密切，但具有不同的研究取向与问题意识。参见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③丁莉等主编：《中国地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戴均良等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高俊良等主编：《中国县级以上政区地名史考》，学习出版社，2013年等，这些书目系统记载了全国各省市的地名信息。

④甘肃省编纂委员会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省》，商务印书馆，1995年；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兰州市志·建置区划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参见王仁康：《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再谈汉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置——与刘满同志商榷》，《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⑥刘满：《汉代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初步探讨》，《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⑦参见张大可：《关于两汉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地理的初步考察》，《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张文轩：《汉代金城郡治及其考证》，《兰州学刊》1981年第4期；蔺子武：《汉代金城郡治允吾故址考辨》，《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⑧薛方昱：《两汉金城郡治允吾故址究竟在何处？》，《兰州学刊》1983年第2期。

⑨陈守忠：《两汉允吾、金城再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⑩薛方昱：《汉代令居地理位置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⑪王宗维：《汉代令居塞的地理位置》，《兰州学刊》1985年第1期。

⑫赵鹏翥：《令居何在之我见》，《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

⑬向红伟：《汉令居县及逆水、涧水考》，《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

⑭王宗元：《汉金城郡令居县故城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汉金城郡乌亭逆水、涧水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⑮王昱、崔永红：《令居塞建立时间考辨》，《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⑯刘国元、吕叔桐：《隋金城郡治地位考》，《兰州学刊》1984年第5期。

⑰娄昉：《也说隋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

置——与〈隋代金城郡治地位考〉商榷》，《兰州学刊》1996年第1期。

⑱刘满：《汉金城县治所地理位置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⑲吕叔桐、牛丽红：《古代榆中考》，《兰州学刊》1985年第4期。

⑳杨永发、侯桂秀：《“榆中”名源及城址变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㉑参见薛方昱：《陇山源名考》，《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中国最早设置的邽、冀二县考》，《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唐宋成纪故址及秦安县名考》，《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街亭故址考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

㉒参见李济阻：《杜甫陇右诗中的地名方位示意图》，《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蔡副全：《杜甫陇右诗两地名考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㉓刘满：《秦皇汉武巡幸陇右地名路线考释——兼论历史上的鸡头道》，《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

㉔李得贤：《隋炀帝西巡道路中几个地名的考实》，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256—267页。

㉕邓明：《兰州军事地名考释》，《档案》2001年第6期。

㉖妥超群、刘铁程：《毕力术江考——明代曲先卫地望及相关地名新证》，《民族研究》2011年第6期。

②⑦王蕾：《金城津、关的设置及其交通路线》，《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②⑧于小秦：《甘肃县名初探》，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②⑨白晓霞：《简论甘肃地名传说的类型化特征及其承载的民间心理》，《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③⑩赵世英：《兰州地名浅识》，《兰州学刊》1986年第5期。

③⑪兰芳：《从地名沿革管窥历史上的兰州》，《档案》2012年第3期。

③⑫参见梁贵仓：《从兰州的地名特征看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中国地名》2010年第10期；张建军：《兰州地名命名的文化心理特征》，《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③⑬文博：《甘肃武山县地名语言文化初

探》，《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③⑭崔明：《甘肃“庄浪”地名的历史人类学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③⑮薛方昱、乔高才让：《甘肃古代羌语地名探讨》，《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3期。

③⑯张鹏丽、李育：《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的城市地貌与地名相关性分析——以兰州市为例》，《人文地理》2015年第5期。

③⑰王宗元：《甘肃省地名综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本文转自《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3期，有删减。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辛亥革命中的甘肃士人

陈尚敏

摘要：“士”是指传统时代由科举建构的一种社会身份。士为四民之首，基于他们对文化资源的占有而成为一个权势阶层，其社会流动基本有两个趋向，上可为宦，下可为绅。为宦时分享皇权，为绅时代表地方利益。若从其权力来源及其接受教育的背景看，他们不构成变革社会体制的动力群体，但清季士人阶层内部发生了一定分化。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开启了以变革为标识的新政。除了这种制度性因素的导引之外，士人拥有的功名高低，在社会中获取的利益多寡以及仕宦之地的不同都会成为影响他们对清政权的向背，进而表现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关键词：辛亥革命 甘肃 士人

“士”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主要是指由科举建构的一种社会身份，功名即是这种身份的象征。清代科举制度设计非常重视区域平衡原则，首先是依据各州县文风盛衰而规定一个较为固定的学额，使得每个州县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生员，俗称秀才；其次是乡会试实行分省取士政策，这样每个省都存在一定数量的举人、进士。士为四民之首，正是基于他们对文化资源的占有而成为一个势力阶层，其社会流动基本有两个趋向，上可为宦，下可为绅。为宦时分享皇权，为绅时代表地方利益。若从其权力来源及其接受教育的背景看，他们不构成变革社会体制的动力群体，但清季士人阶层内部发生了一定分

化。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开启了以变革为标识的新政。除了这种制度性因素的导引之外，士人拥有的功名高低，在社会中获取的利益多寡以及仕宦之地的不同都会成为影响他们对清政权的向背，进而表现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总之，遭际风云变局，他们或激越超迈，或隐忍内敛，甚或两种相反情感兼具一身，很难以理性来规范，这正体现了他们身处非常时期的一种多歧面相。

—

陕西反正之时，甘肃谘议局正在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他们直接参与了东征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在当清政府征诏国民对于政体

意见时，总督长庚召集在省官绅进行讨论，谘议局议员拥护立宪，反对共和，遂有正、副议长张林焱、刘尔忻代表甘肃谘议局致袁世凯、伍廷芳反对共和电文。

途因政争日亟，牵及兵争，荼毒生灵，深堪痛哭。两公为民请命，不惮勤苦，可感可泣。惟昨电抄贵代表坚持共和之局，林焱等揆时度势，万难缄默自安。查我中原民族修养与专制政体之下者四千余年，服教畏神，久成习惯。今改用君主立宪政体，已越开明专制之梯级，尚恐难于急就范围。不过以君主名义号召群伦，亿兆自能服从。倘骤躐共和一阶，则民情惶骇，谣诼纷乘，草泽英雄，何胜指数，正恐非少数代议士所得而左右之，将来不至斩木揭竿，四海鼎沸不止。而蒙藏地广人众，难保不生事端。是公之欲伸民权者，适以贼民命矣！思之痛心。公如能采刍蕘，确定君主立宪政体，某等自当惟民是从，共勦新政。倘力持共和主义，则某等虽至愚极弱，实万不敢随声附和，肝脑吾民。亦惟有联合陕甘新三省及他省同志，共图保境，遥戴皇灵。决不承认共和主义。俾我同胞自相残杀，召他族逼处之忧。惟公实图之。嗟嗟！事贵因时，一蹶难振。愿公熟思审虑，毋为觊觎我者怅也。^①

甘肃谘议局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是清末地方宪政运动在甘肃的重要成果。其议员27名，可考身份的有24名，其中17名拥有科举功名。^②可以说，甘肃

省谘议局作为民意机关，深深地烙着绅权色彩。进入谘议局的士绅在无形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本。

上引电文，已有论者做过解读，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将士绅阶层置于阻挡历史进步的一方，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惧怕社会变革是既得利益者的常态表现。另外，从士人主要的人生经历看，他们自发蒙到漫长举业的完成，都离不开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儒学中诸如“君臣之辨”的教条会成为他们抵制社会变革的心理暗示，甚至将自己既得利益看成是皇权的恩赏，加剧了他们对现实政权的向心力度。

张林焱和刘尔忻，皆皋兰人，晚清翰林，都有短暂的在京仕宦经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分别任甘肃文高等学堂教务长和总教习。张、刘二人不仅拥有着显赫功名，还都有着参与地方学务的经历。基于稽古佑文的传统，后者其实更能赢得地方声望。声望是一种无形资源，对一个人的成功会产生重要影响。有关张林焱的生平材料，现在能见到的不是很多。但知他有着良好的家世背景，其父张国常，进士出身，曾授刑部主事。退職后，主讲兰山书院达二十多年，有一代宗师之誉。家族势力作为传统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对其成员立足地方、谋取政治经济利益提供便捷。刘尔忻是清季民国陇上著名士绅，曾参与过地方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置。早在他任职翰林院编修时，就因朝政腐败，遂萌“归去来兮”之想。据他的学生回忆，刘尔忻在政治上主张

二

君主立宪，但对于满清之积弱，外人之侵凌，则未曾不义愤填膺，时寄感慨。^③在辛亥革命期间，对待陕西及全国各地的举义，曾以曾国藩、左宗棠自期，若总督予权，将“率领陇上健儿席卷三秦，扫荡河洛”，建立中兴功勋，并劝其主持的存古学堂学生“回家办团”“学罗泽南、李绩（续）宾，助成他忠君保国的壮志”。^④另外，议员如基生兰，岁贡出身，籍隶西宁府湟中县，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际此变值沧桑，既无旋乾转坤之略，又无辅世长民之德；惟有林泉啸傲，以尽余年。至盖棺时，得书‘清处士某之名’，是为深愿。”^⑤王黻堂，优贡出身，安定人，清亡隐居不出，弥留之际自挽云：“为报君恩忘我老，好留臣道教人忠。万里孤魂朝帝去，一腔忠愤再生愁。”^⑥

今天重温这份电文，其忧惧并非毫无道理。如政治的狂飙突进，缺乏必要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以“反满”为职志，撕裂民族关系，充溢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致使蒙藏异动；会党是当时社会成员异化的结果，社会对其行为普遍持恐惧、戒备心理。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曾把利用会党看成是一种策略，当时陕西的革命政权“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中”“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⑦哥老会成员认为陕西光复纯系他们的功劳，居功自傲，“气焰甚张，一日千丈”，在各地遍开码头，广招党羽，“办支应，理词讼，直代县官行政，甚至公然以地方主人自居。鱼肉良懦，苛派钱款，乡民畏惧，直似满洲入关时驻防”。^⑧

黄钺秦州独立，在甘肃辛亥革命史上是一件大事。在力求两个政权和解的过程中，秦州士绅多方努力，化干戈为玉帛。其中张世英用力最勤，作用亦最大。论者多谓张世英赞襄黄钺独立，有革命倾向。对这一问题，确有商榷的必要。

张世英，字育生，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进士，获馆选，知陕西渭南等县二十余载，政绩卓彰。“大计卓异，除州陟府，传旨嘉奖者五次。政绩为三秦之最，循良称全陕第一”。^⑨又因在陕西渭南实施自治新政，深得总督长庚器重，宣统二年（1910年）调甘于本籍秦州试办自治。其实，张世英与黄钺一开始就非钟鼓和鸣。黄钺至秦，时在宣统三年（1911年）阴历十二月十一日。“遍邀绅士，先祖（张世英）乃出见，虚与委蛇。留先祖食宿于署，辞以他故。以议论不合，犯敢死军之怒，几濒于危”。^⑩翌年阴历二月初一，黄钺独立，情势更趋危迫，张世英在“学堂万岁位前拈香涕零久之，初三日上黄取消书”。大意为黄钺久留秦州，事态“将至不可收拾，与其留以有待，不如健以致决；与其力争上游，不如俯顺輿情”。^⑪黄钺立足秦州，四面楚歌，急需地方社会支持，像张世英这类具有相当社会声望的人，显然是他最需要团结的。

辛亥川陕事起，（张世英）总理城防，群情赖以安。次年春，戍卒（指黄钺）忽倡独立，省譴防军亦同时至，几交斗矣。乃念切殃

池，挺身排解，而摧残备至，严成集矢之的，属濒于死，弗顾也，终奏和平解决之效。^⑫

黄钺倡议独立，省边防军至，几交哄。赖先生曲予排解，免遭摧毁。虽屡濒于危，弗顾也，然卒奏和平解决之效。^⑬

两段文字的作者，均系秦州人士，后者还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其乡土视角似更能逼近历史真相。张世英斡旋于对峙的势力之间，其真正目的还在于维护桑梓安定，免遭兵燹蹂躏，其行为并未逾越传统士绅境界。“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⑭

辛亥风起，系关国体变更，时局走向何处？实难作出准确判断。在一个失范的历史时期，是非判断唯实力是听。民国初建，笼络地方实力派以维系时局，这是北京政府用心所在，袁世凯任命前甘肃布政使赵惟熙为甘肃都督就是基于此。赵惟熙积极主张镇压陕西新军，站在新生政权的角度，其可诟病者自不待言；但另一方面，他占有着省城这一区位优势，并接受了旧政权所有的国家机器及官僚机构，拥有着便于政权存在的有形和无形资源。这是孤悬陇南、存在了不足三月的甘肃临时军政府所无法比拟的。张世英对此看得十分清楚：“黄（黄兴）以孙逸仙自命。任黄（黄钺）为督，尊之？实以卑之！且全甘未认而一隅认之，其不疑为阿好者几希矣。”^⑮依其二十年做知县的阅历，在时局趋于明朗时，奉劝黄钺不要为道义、公理之类的空言所误，认清事态，早做明断，“设法速为解决，不可少待”。^⑯张世英保境

安民愿望的实现，其前提就是要黄钺放弃斗争，至于他司职黄钺甘肃临时军政府，只是一种在非常时期的权宜之策。

三

早在清政府征召国民对国体看法时，王之佐、邓宗等就上书谏议局议长张林焱，要求停止甘肃军东征以维护共和；黄钺秦州独立，也得到陇南中学及留学省外学子在舆论上的支持。上述两方面的内容被视作是甘肃辛亥革命中的亮点，但并未对其致因做必要的探讨。本文认为除了当时甘肃的新学教育之外，还与科举废止有关。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诏废八股，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首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以上考试，均不准用八股程式。同时谕令各省书院，在省城者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清政府当初的打算，希望通过科举的变革，使其与新学有一个并行的阶段。因为科举牵涉着数百万期望以此实现上升性流动的士子们的切身利益，其骤然废止必然会引发强烈的社会震荡。但最终的结果是，清政府无法抵挡一些激进督抚们强烈要求废除科举的呼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被废止。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变革，对仅具低级功名的士子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对清政府的向背，也左右了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时任陕甘总督崧蕃于省会兰州建甘肃大学堂，后更名为甘肃文高等学堂，这是清末甘肃教育新政的重要成果之一。“自上年奉文改设大学堂，即传谕两书院（兰山和求古两所省级书院），裁革八股、试帖，改课策论讲义，所取课艺，以议论确实正大为宗，凡剿袭诗文声调者，概从屏黜”“至建立大学堂一节，奴才已于去年秋见咨商湖广总督张之洞，请代为延请西学教习二三人，带购切要时务书籍数十种来甘，刻尚未到，又于湖南采购新刊约章分类辑要三百部，计九千册，现已全数运甘。查核中外交涉、新旧条约、出使通商各事宜，尚为赅备，已提出十部，分发两书院，责成算学教习，就现有时务算学各种书籍，令肄业诸生互相研究，渐开风气”。按照清政府谕令，大学堂应由省城书院改设。因甘肃兰山和求古两书院“逼近城市，宅舍无多，只可留备蒙养学堂，若改设大学堂，不敷布置”，大学堂建设只能另择新址。^⑮总督崧蕃聘请西学教师、购置新书，一方面是为将来的大学堂做准备，同时也是为了因应变革后的科举。

八股废除，科考内容也不再囿于《四书》《五经》、孔孟程朱，而是转入现实，放眼世界。这不仅开阔了士子们的视野，而且更新了他们的观念。赵元贞在其自传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很有意味。他说，辛亥革命前，他在家乡正宁做秀才，“听到西安满城旗人生活的腐败，朝廷给他们的特恩等等，也听到外面还有革命党，心里有些不满

清朝的统治，而对革命党却表同情，当然对谁也不敢露齿”，只在过大年贴春联时，略表“心迹”，其下联是“花枝欲动春风寒”。村中其他秀才，“高年级学生倒也不少，他们对各门上对联的书法，品评的人很多，却没人领会这个下联的深意”。清季，革命之风劲吹，也让边隅士子感受到一丝丝的寒意。但这寒意是春风带来的，何况它还孕育着“花枝欲动”的新世界。革命者的“排满”政策如若站在一个建立多民族国家的高度，有着诸多缺陷，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却极具社会动员性。赵元贞的对联写作其实是有感而发：“到‘入学’（即取得秀才一引者）前后，渐渐知道了些世事，看见前任汉人知县好，人民称他为‘黄青天’，后任满族知县差，人民称他为‘广浆子’。”清代“首崇满洲”，旗人高高在上，特权往往伴随着腐败，最终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根基。赵元贞有如此“觉悟”，当然还与他在省城学堂的求学经历有关。赵元贞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七岁时到庆阳考棚考取了秀才，因在家乡生活无计，遂出外谋生，徒步到兰州。后来遇到文高等学堂招生，就去应考，录取后，每月就有了二两四钱的伙食费。^⑯

甘肃大学堂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建成，学员“就最后乡试荐卷诸生中，择青年强迫拔送”。^⑰科举废止后，清政府为其遗留士人寻求出路而采取的补救措施中，就包括鼓励他们进入学堂，以便将来加入到新的社会流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兰山书院改为甘肃优级师范学堂，其“招收

廩、增、监，由各州县选送，亦有由各府中学肄业生中调来者”；求古书院初改为甘肃速成师范学堂，后又改为初级师范学堂，其“学生来源系调各州县廩、增、附生入堂肄业”。^③当时的学堂其实并不为人所看好，否则就不会有“强迫拔送”之说。就是在科举废止之后，依旧不乏怀揣科举梦的秀才。

在甘肃优级师范学堂筹备阶段，各县选送前来的学生约达200人左右。这些秀才们来省的目的，多数是谋官求职，也有幻想科场重开，再考举贡的。现在听说还要学习几年，有些人便熬耐不住，故预科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份正式开学时，就只有80余人入学。报考初级师范学堂的人较多，他们多是冲着每月8两银子的膏火而来，当时省城一般官署的文书缮写人员的月薪仅有4至6两，每百斤面粉的售价也仅8钱左右。除此之外，学生的书籍、文具全部免费。由于学生偏好及其出身等原因，学堂科举气氛很为浓厚。^④

文县秀才韩定山，宣统二年（1910年）在甘肃求古学堂学习。据他的观察，当时的学生一般对课业不感兴趣，课堂上的学习，只是随铃声上下，虚应故事。课外对康有为的《不忍》杂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庸言》《国风》等刊物，则好之如渴。当时道升巷有个芈石书社，专门兜售这类新书，存古学生中不少日日在这书社盘旋之人。同时天水的丁佩穀、杜濬源等曾受乡先生陈竞存的影响，对这样的刊物尤多方罗致，随时介绍；而伏羌（今甘谷县）

的黄启虞等因曾在陆军学校，受革命影响深，常秘密向进步同学，介绍邹容、张炳麟的《革命军》《昌言报》和后来的《民报》《荡虏丛书》之类的革命刊物，虽极端隐蔽不敢公开，但作为枕秘，深宵赶读者颇不乏人。至于以顾、黄、王三先生的著作为依据，从中领略革命排满意义者，尤指不胜屈。^⑤清季，秦州风气早开，实与陈养源关系密切。陈养源即上引的天水乡先生陈竞存，“竞存”为号，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进士，曾知山东夏津、成武等县，退职后久居上海，与蔡元培、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多有接触，“印欧西各学说以饷国人思，为国振起群材，又择最切要者频寄里中，州之士子知有新学新书，实自养源”。^⑥

科举废止在当时意味着士人上升性路径的断裂，特别是对那些仅具低级功名者，多年寒窗苦读化成泡影，利益的被损害而郁结的怨愤，其发泄也许会有多种途径。如对学堂学习的消极应对，特别是对宣传革命报刊书籍的热衷其实是一种反体制倾向的表现。人们在接受新生事物之前，往往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观望期。学堂在时人眼里并不具吸引力，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在。事实上，像王之佐、水梓、邓宗、赵元贞等人均出身寒素，他们之所以活跃在民国甘肃政、学两界，就是因为他们较早进入学堂，其后又获得到国内外游学的机会。

四

清季，革命思潮如燎原之火，不可抵

挡，但当在辛亥年真正来临之时，还是在多人的意想之外。秦州的刘远峰，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进士，曾官刑部主事，退职归里后，在省城求古书院作过多年讲席。“辛、壬之际，读逊位诏书，泫然流涕，曰我大清亡矣，哽咽不能成声”。^②

辛亥鼎革，清帝逊位，直如树倒猢猻散，故土成了那些宦游他乡者唯一的归宿，其间几多黍离之叹。甘谷的任廷扬，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进士，时官法部员外郎。“辛亥之变，冬间，怅然偕秦安晓峰侍御取道北塞，沙漠冰雪，间关旋里。”^③礼县焦志贤，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进士，时官户部主事。“辛亥冬间，四海沸腾，万事坠堕。政改后，部案山积，无从交管。君恐有遗坠，独为守视者月余，及收替有人，乃得卸责。闲居时，甘人宦京者已星飞云散。允尚留滞都门，同居于古寄园。昼则抵掌追感今昔，每夕阳在山，出而沽酒，长安市上，对酒狂歌，以寓黍离麦秀之悲。壬子九月，恐资斧不继，遂相将踰崤峻、入潼关，枪林炮雨中，冒险提携，卒得度陇，而赋归来之辞。”^④天水杨润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进士，时官法部主事。“宣统辛亥，君供职在都，值国变，中原阻兵，由北边犯寒旋里。”^⑤

也有例外者，如临夏邓隆，光绪末科进士，河州人，时知四川南充县。“武昌起义，川人响应。适李鉴亭观察由奉入蜀，议挈甘人同旋，余亦与焉。回省后，与君从事议会，赞佐李公，发扬民治精神，见嫉当道，

假武力以祸李公，余等星散。”^⑥引言中的李鉴亭，即李镜清，鉴亭为字，临洮人。清末拔贡，朝考一等，先后任四川蒲江、江安等县知县，云南巡警道，奉天巡防右路统领等职。在与革命党人兰天蔚等交往中颇受新思想感染，主张实行宪政，召开国会。宣统二年（1910年），因参加锡良领衔的吁请清政府设立内阁事，失败后奔走入川。时值四川发生保路风潮，川督赵尔丰令李镜清统兵镇压，他坚辞不受。武昌首义成功后返甘，就任甘肃临时省议会议长，不久被刺。

注释：

①张林焱、刘尔炘：《致袁世凯、伍廷芳反对共和电文》，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②张慎微：《宣统年间甘肃咨议局概述》，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内部发行，第11-38页。

③赵元贞、水梓、谈凤仪：《清末甘肃文高等学堂的片段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106页。

④韩定山：《我所亲历的甘肃存古学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109-114页。

⑤张慎微：《宣统年间甘肃咨议局概述》，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内部发行，第11-38页。

⑥民国《重修定西县志》卷28《人物二·清》。

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154页。

⑧张林焱、刘尔炘：《致袁世凯、伍廷芳反对共和电文》，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⑨民国《天水县志》卷11《人物志》。

⑩张绍蕃：《清授中宪大夫花翎陝西候补知府显祖考育生太府君行述》，民国铅印本，存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历史文献阅览室”。

⑪张绍蕃：《祖庭闻见录》，民国铅印本，存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历史文献阅览室”。

⑫民国《天水县志》卷11《人物志》。

⑬胡楚白：《秦州光复见闻杂咏》，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9页。

⑭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⑮张绍蕃：《祖庭闻见录》，民国铅印本，存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历史文献阅览室”。

⑯张世英：《再上秦州临时军政府书》，民国《天水县志》卷12《艺文志》。

⑰《陕甘总督崧蕃奏筹办学堂情形折》（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见朱有璈：《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7-458页。

⑱赵元贞：《赵元贞自述》，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1页。

⑲黄炎培：《记甘肃文高等学堂》，见朱有璈：《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68页。

⑳皇甫均：《甘肃近三十年教育史要初稿》，稿本，存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历史文献阅览室”。

㉑刘用：《清末甘肃师范教育概况》，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98页。

㉒韩定山：《我所亲历的甘肃存古学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109-114页。

②③民国《秦州直隶州续编》卷3《人物》。

②④刘尔炘：《刘远峰先生寿序》，见陈尚敏：《清代甘肃进士传记资料辑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296页。

②⑤任承允：《四品銜法部编置司员外郎任君賡六墓志铭》，见陈尚敏：《清代甘肃进士传记资料辑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2-94页。

②⑥任承允：《焦君绍颜墓碑》，见陈尚

敏：《清代甘肃进士传记资料辑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8-99页。

②⑦任承允：《前法部主事杨君雨亭墓表》，见陈尚敏：《清代甘肃进士传记资料辑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105页。

②⑧张质生：《老友邓德舆先生墓表》，见陈尚敏：《清代甘肃进士传记资料辑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116页。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

甘肃省志6部、市（州）志2部通过终审

2019年9月6日，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通过对《甘肃省志·政府志》《甘肃省志·发展改革志》《甘肃省志·扶贫志》《甘肃省志·文化志》《甘肃省志·工业经济志》《甘肃省志·民族志》6部省志和《张掖市志》《临夏州志》2部市（州）志的终审。会议认为终审的8部志书，在编纂中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内容丰富，资料详实，篇目设计合理，体例完备，突出了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符合新编志书的要求和质量规定。至此，甘肃省市（州）志全部通过终审。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 李佳潞供稿）

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现状的创新性发展研探

任瑾洛

摘 要：通过梳理、分析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的利弊因素，研究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方式方法，提出在主导力量、展览技术、管理方面进行创新，创建智能集成方志馆。

关键词：方志馆 公共文化服务 创新发展

方志馆作为收藏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宣传展示国情、地情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地方志工作对外展示的一扇窗口。

方志馆公共服务创新性发展对于地方志工作机构来说，可以宣传方志工作，扩大地方志影响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整体配置效率。方志馆公共服务创新性发展的重点是要给社会大众提供更高效优质的服务，提升方志文化影响力。

一、有利于方志馆公共服务创新性发展的因素

1. 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

2015年8月25日，《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在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中都提到“方志馆建设”，并在基本原则中提出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修

志的优良传统，认真总结地方志工作的经验教训，深化改革，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方法创新。”

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方志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2017年6月12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对方志馆概念与功能、方志馆建设规划与规模、方志馆建筑选址与设计、方志馆建筑标准与机构人员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规定的出台，对方志馆建设的规范引导，也为方志馆建设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2. 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逐步增加

近十余年来，各级政府的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大多数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传承优秀方志文化,通过方志馆这个载体来宣传优秀方志文化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2008年,中国国家方志馆申请立项,200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整体购买大楼,总投资1.3亿元。北京市方志馆与首都图书馆二期合建,总投资4.7亿元。南京市档案馆、方志馆合建,总投资2.7亿元。2018年,山东省档案馆、方志馆合建,总投资约2.16亿元。上述项目反映出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力度和决心,这是各级地方志机构争取建设资金的有利条件。

二、制约方志馆公共服务创新性发展的因素

1. 常见定位误区

方志的“志”,本意是记载文字、文章,方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被归类在史部的地理类。中国古代的史馆、国史馆、实录馆功能就是藏书和修史。设馆修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兰台、东观。因为在藏书之地修史,资料丰富,有利用之便。这种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基因,也镌刻在方志馆体内。当今大部分方志馆的定位都是藏书和修志办公二合一。新世纪以来,记载事物的表现形式和客体媒介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表现形式不再仅限于文字,客体媒介也不再仅限于纸张。仅把方志馆当做一个藏书馆来管理运行,显然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2. 设施、产品、活动和服务缺位

目前,图书馆正在由提供图书服务转向提供知识服务,资源存储和资源传输向自动

化和信息化迈进。大型公共图书馆在空间利用方面向第三空间化发展,不再以图书收藏为主体,而是集读书、休闲、餐饮、旅游于一身的公益综合体。新建博物馆和展览馆均着力加强自动化管理和信息化服务,并且不断深入结合数字人文、3D打印、智能定位、虚拟现实、物联网等前沿科学技术,给公众提供崭新的文化服务体验。方志馆在设施、产品、活动和服务方面,同图书馆、博物馆相比较,有很大差距。在服务设施方面,很多方志馆不向参观者提供电脑、电子阅读器、电子扫描笔等电子设备,没有固定的电子信息设备使用区域。很多方志馆,没有大型数据供应商提供的论文下载,也没有配套的数据支撑,需要的资料只能采取手写摘抄的方式。在馆藏资源方面,许多方志馆藏书中志鉴资料性书籍杂而不精,志鉴理论研究类型书籍少;有些则面积较小,藏书管理不规范;一些方志馆没有图书下架管理,通过多级地方志机构的图书交换而收藏了很多与该行政区划毫无关联的其他地区的志鉴成果,这些图书尘封在藏书架,无人问津。在馆办活动方面,数量有限,范围较小。举办的活动没有抓住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热点,方志界外的参与度较低。在信息化服务方面,力有不及。

3. 社会力量参与程度低

从接受社会捐赠和志愿行动的数量和规模分析,方志馆的社会普及度依然任重道远。通常来说,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类展馆的捐赠形式有资金、文献信息资料、设备等。方志馆的私人捐赠以图书捐赠为主,量

小偏少，基本来源于方志界退休老同志。很多方志馆没有正式的接受捐赠制度。国内很多大型的博物馆均有志愿解说，一些退休的老同志发挥余热，替游客作免费解说。故宫博物院的志愿者团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进入团队还需严格筛选。图书馆也有相应的志愿服务团队。相较之下，方志馆的志愿解说，则显得较为薄弱。

从私人收藏的角度分析，也远远不足。近二十年来，私人创办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热潮较高，而且名气也在逐渐上升。马未都创办的观复博物馆、高晓松创办的杂书馆，都是通过其个人IP提升影响力。但是在个人创办方志馆方面，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细则进行规定。私人创办方志馆，寥寥无几，有限的几例基本是以藏书为主。山西省古县李建国将其个人藏书分类编目，通过县图书馆和档案馆网站对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类似李建国的方志书籍收藏爱好者在全国范围内有不少，但是有能力对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却不多。

4. 创新思维稍显不足

从布展形式上分析，很多方志馆创新思维稍显不足。部分展馆没有引入成熟的科学技术为展示内容服务，还是以文字图片展为主，难以抓住参观者的眼球。有些方志馆虽然采用了声光电等方式结合展览，但是内容较为单调，没有将前沿科技和地方志文化较好地融合。

三、方志馆公共服务创新性发展方向

1. 主导力量创新

目前，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对象和

参与成分都过于单一。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运营主要分为三种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园区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方志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运营，基本上是政府主导模式，其他两种模式目前少有出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工作是值得尝试的新路径，将方志馆公共服务由单一建设主体向多方主体参与建设及运营方向转移。在方志馆文化服务提供过程中，需要不断积极参与当地规划布局的公共文化项目，以公共财政引路，引导社会各界进行资助和捐献。完善捐赠制度，实施地方志品牌化工程，适度宣传和回赠纪念品，给捐赠人士以荣誉感和获得感。探索建立文化志愿者的选拔、培训、激励机制，鼓励、引导和支持各界人士志愿参与方志馆公益性文化服务。文化服务提供者的扩充，一方面有利于发展方志文化事业，另一方面有利于为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更多关注和受众，一举两得。

2. 展览技术创新

要推动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不少方志馆研究方面的论文提出，要依靠互联网技术，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但是对具体的细节应用，只是大略指出需要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在方志馆建设中，没有自成体系的研究。未来方志馆的建设形式应是智能集成方志馆。集成是指融合新兴前沿科技研究，建立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平台和架构基础之上，以多种线上、线下的软硬件结合的方式进行地情文化的展示。智能是指方志馆的

资源运营情况必须由机器智脑不断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调整调配方志馆的各类软硬件设施和多元化的媒体素材,从而更智能地向公众提供内容丰富、个性定制、多样多彩的文化服务。一些方志馆也在智慧方志馆建设方面进行了尝试,比如广州市方志馆推出了智能机器人,但是距离智能集成的标准有所差距。

3. 管理运营创新

选址。《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颁布后,多地的方志馆建设开始争取立项。为方便方志馆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文化服务,在选址中要注意选择文化展馆集群地。方志馆建设在选址时,应充分发挥集群优势,尽可能加入到公共文化设施集中项目,比如某某省文化公园系列展馆、某某市“三馆一厅”等A2类图书展览设施用地。通过集群建筑的形式,既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观感,又方便市民、游客对方志馆进行口碑宣传,无形中增加方志文化服务的影响力。

布展。目前国内很多方志馆仍然是文字内容占据较大比例。文字在短时间内的冲击力和直观表达力量是不够的,要通过编剧、道具师、手绘师、原画师、建模师等专业性人才,把地方志资料里极具价值的、人无我有的文字性内容挖掘出来,用多媒体的形式表现,大量使用视频、模型、沙盘、塑像等形式,尽可能压缩文本内容,使方志馆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尽可能丰富多彩,在视觉、听觉效果上塑造震撼力,以满足公众文化增长的需求。

互动。结合方志馆的发展历史和各文化

展馆的现实情况来看,双向互动是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应有之义。除却展览元素和公众的互动之外,还需要丰富的互动元素,增强方志文化服务的活性。在这方面,可以通过组织邀请专家、名人作报告、讲演,组织各种地方特色艺术表演,以地域文化为基础举办公益课、手工制作、亲子活动、书词研究会、年俗展览会等各式各样的活动,并将这些活动送进机关、军营、校园、社区、农村。用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起到宣传方志文化与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的双重作用。

参考文献:

- [1]刘玉宏:《论方志馆的性质与功能》[J],《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
- [2]毛珏琚:《试论方志馆的功能与定位》[J],《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20期。
- [3]刘德敏:《新型方志馆建设与管理初探》[C],《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究优秀论文集》(2016)。
- [4]张旭:《关于个人方志馆的法律思考》[J],《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20期。
- [5]游桃琴:《浅谈方志馆的独特地情定位与社会价值》[J],《新疆地方志》,2014年第1期。
- [6]黄文记:《试论方志馆在地方文化中的新定位》[J],《广西地方志》,2013年第3期。

(作者单位: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地方文献研究所)

张维与《甘肃通志稿》

姜洪源

编者按：张维（1889~1950）甘肃临洮县人。甘肃历史上有三部通志，《甘肃通志稿》是一部研究西北问题的重要参考书，张维参与编纂，历时七年而就。

甘肃的省志，是陕甘分治之后开始编修的。甘肃八府三州，明代皆隶属于陕西。清康熙三年（1664年），以陕西布政使司分驻巩昌（今陇西），六年（1667年）改为巩昌布政使司，七年（1668年）复改为甘肃布政使司，迁驻兰州。康熙八年（1669年），甘肃正式建省，包括今甘、宁、青三省。

雍正六年（1728年），由许容主修、李迪等编纂《甘肃通志》，乾隆元年（1736年）成书，共五十卷。这是甘肃的第一部通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升允、长庚复修，安维峻纂《甘肃全省新通志》一百卷。这是甘肃的第二部通志。

本文所说的《甘肃通志稿》，是甘肃的第三部通志，也是三部通志中体例最严谨、材料最详实的一部。这部志书始修于民国17年（1928年），甘肃省府委派吴瀛章任总办、杨思任总纂、秦望濂任襄办进行修志的筹备。同年2月27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研究通志局成立事宜，并议定通志局设立编

纂部和事务部。4月11日事务部先期成立，开始办理日常事务工作。6月9日接省政府通知，将原豫、陕、甘新志甘肃材料委员会裁撤，已收集的资料全部移交通志局。通志局经一年的筹备，于民国18年（1929年）3月11日正式成立，开始《甘肃通志稿》的编纂工作。

通志局成立之初，确定编制为79人，除吴瀛章、杨思、秦望濂任原职外，协纂有张维、汪荀、慕寿祺；分纂有廖元佶、程天锡、王烜、邓隆、李鼎超；采访有蔡景忱、冯国瑞、王海帆、司秋沅等。确定各门类编写人员为舆地：张维；民政、军政、教育、外交：王烜；职官、山水、方言：李鼎超；艺文、金石：廖元佶；建置（包括物产、古迹）、选举、拾遗：冯国瑞、司秋沅；民族：邓隆；财赋：汪荀；人物：程天锡；纪事（包括割据）：慕寿祺；边防：聂守仁；变异、人物：李娥生；古迹、生计：王海帆；晷度、气候、疆域、寺观：王健庵；仓库、

廨署、庙坛：司秋沅；县市、文化、村里、物产：冯国瑞；军制：蔡景忱。

嗣后，由于陇上迭遭大旱，民不聊生，政局动荡，通志局编务终因政界易人，经费无着，民国19年（1930年）初被迫中辍。

民国20年（1931年）7月，省政府根据内政部通知改组通志局，成立通志馆。10月，省政府第二十二次委员会议通过通志馆章程、馆长人选及编制、预算等，11月1日通志馆正式成立。改组后的通志馆经费和人员编制都比通志局减少将近一半，内部仍设编纂部和事务部，杨思任馆长，张维由协纂改任副馆长兼总纂，聘分纂和编辑各4人，以及主任、股员、办事员和录事等共计46人。拟定了工作程序：一是先搜集新资料，整理旧稿，材料齐备后编纂各个门类；二是函催各县继续采访；三是派员前往南京、北京及东南各省补充资料。

民国22年（1933年），张维按照拟定的工作程序，赴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陕西等地收集和补充资料，历时两年。民国23年（1934年），张维到杭州浙江省立图书馆收集资料，答应浙江省立图书馆甘肃省志编修完成印刷后寄赠给浙江馆一部。回到兰州后，张维寄出了先行编出并由北平大北印书馆印刷的《甘肃省县总分图》及《甘肃地理沿革图表》。为此，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字叔谅，陈布雷弟，著名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于同年7月23日给张维一封感谢函：“拜读大教，兼奉珍贻，不胜欣感。前者，文旌访书杭州，

诸承教益，钦佩无涯，正以未尽地主之谊，引为歉疚……”，并将《甘肃通志稿》例目等刊载于馆刊。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浙江省立图书馆并未见到纂就的志书，遂于民国24年（1935年）11月7日给张维来函询问此事，函称：“鸿汀先生道鉴：客夏执事访书莅杭，枉临敝馆，饫聆谏论，指示多方，钦佩何似。当时曾蒙以贵省新纂《通志》行将于岁杪杀青，运沪付印见告，并许刷成之后即当寄赠敝馆一部，以光典藏。其序列及修志缘起之在京印刷者，且允于返京后邮赐《馆刊》刊布，以快东南人士之先睹云云。私衷至为纫感。而今一别逾载，想因公冗，未遑简札，或贵省志尚未出版也。引领北望，无任驰系。用敢虔修寸柬，轻用上闻，幸赐明教，俾纾悬系为感为盼。专此，敬候道绥。”（此函原件现存甘肃省图书馆）这就是后来张维哲嗣张令瑄曾撰文说的：“当时浙江图书馆将《甘肃新通志稿》例目及编纂经过，披诸馆刊，‘以扬西北倡导文教之盛旨，而励海内各省以继起’。”

时《甘肃通志稿》的编纂工作经费困难，又兼地方不靖，修志工作进展缓慢，已修成的书稿还不到全书百分之七十。至民国24年（1935年），修志期限已到，经费停止，而初稿仍未编就。张维在万般无奈之下，与邓隆、廖元佑、朱秉衡等义务续修。后其他编写人员先后离开，张维自备经费，艰苦支撑。到民国25年（1936年），《甘肃通志稿》终于脱稿，分舆地、建制、民族、

民政、财赋、教育、军政、交通、外交、职官、选举、任务、金石、艺文、纪事、变异、杂记等17纲，凡130卷，450余万言。其中，已编就的《甘肃省县总分图》（卷一）及《甘肃地理沿革图表》（卷二、三），由杨思署端，作为《甘肃通志稿》一至三卷单行本已于民国23年（1934年）先期付印。其余稿本，正拟筹资付印，又因抗日战争爆发，救亡图存，出书动议遂被长期搁置。

《甘肃通志稿》遂以手稿形式，度藏于现甘肃省图书馆的前身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

未能付印的《甘肃通志稿》，成为张维放不下的心事。作为志书总纂，并为之呕心沥血，力主笔政多年的张维始终惦念《甘肃通志稿》的缺憾之处和亟欲增补续写事宜，曾说，《甘肃通志稿》“纪述至民国十七年，分省（甘、宁、青三省析置）为止，今又事隔十五六年，所应续载之事，奚翅千万？将来若得连贯补入，用成完构，则剗剗稍迟，正若留为吾人参考订稽之时地也。”因而，直至1949年前的10多年中，张维利用公余之暇，对志书手稿内容未尽之处，进行了考订与补充，今天在甘肃省图书馆藏《甘肃通志稿》的清抄本上，仍可见到张维的许多校注、眉批及飞签。

关于民国23年（1934年）出版的《甘肃省县总分图》，兰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原主任邓明撰文称，兰州收藏家杨楠购进一盒历史地图，封面题签为《甘肃省县总分图》，

右上部为“通志单行本”，中部为“甘肃省县总分图”7个大字，左下部为“杨思署端”，均由杨思以楷体题写，背面正中排印仿宋体两行：“民国廿三年北平大北印书馆承印”14字。目录六行：“甘肃通志/舆地、总分图/省图一/县图八十一/青海图一/阿拉善额济纳图一。”其中“甘肃通志”下钤盖“张维纂次”四字。杨楠购进的正是《甘肃通志稿》卷一《甘肃省县总分图》。邓明说，杨楠所藏的《甘肃省县总分图》，比起存世的其他《甘肃省县总分图》，更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根据考证，杨楠购进的地图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科的军用地图，在抗战中为保卫西北抗日大后方，畅通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线发挥过重要作用。

继民国23年（1934年）铅印出版的《甘肃通志稿》之《甘肃省县总分图》及《甘肃地理沿革图表》之后，时隔30年后的1964年，甘肃省图书馆油印了《甘肃通志稿》的《甘肃舆地志》《甘肃建置志》《甘肃金石志》等部分，约200余万字。1994年，《甘肃通志稿》作为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影印出版，第一次将全书内容展露于世。这一影印本是以志书的墨写楷书手稿写本为底本的，笔者在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部曾有幸阅读。后《甘肃通志稿》写本，移藏于甘肃省图书馆九州台藏书楼，得到妥善收藏。

（作者单位：甘肃省档案馆）

清代乾隆年间两当知县秦武域述略

曹建国

编者按：清乾隆年间两当知县秦武域，在任五年。修文庙、启圣祠、戟门、文昌宫；开永利渠；添建新廨；制订“川中植桑，山畔种椒”规划；编纂《两当县志》，有西北诗人之称。

秦武域，字紫峰，又字于镐，号福亭山人，山西省曲沃人，约生于雍正三年（1725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举人，著有《闻见瓣香录·附西湖杂咏》四卷（一、二）、《笑竹集·薇郎集附》十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逢吏部拣选，秦武域以一等引见，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八月任两当县知县。乾隆版《两当县志·志人第三·职名·县令》：“秦武域：曲沃人，举人。”道光版《两当县新志·卷之七官师·国朝·两当县知县》：“秦武域：曲沃人，举人，乾隆三十二年八月任”。期间因囚犯越狱被罢，责成就地协同缉拿，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被赦另用，在两当县共五年时间。“一官悔自误，五载方得归”（以失囚在地方协缉五年）^①。秦武域任职两当时，深具做官须为民做主的警醒意识，以关心黎民疾苦为

己任，官声有口皆碑，名望极高，颇有政绩，也不乏文人情怀，有多篇为两当所作诗文传世。秦武域执政两当时的政绩，在清代地方官员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一、兴修水利，开永利渠，以防水患

“柳叶一湾迷灞岸，桃花三月认苏堤”，秦武域将城北门外“两当八景”之一的“窑渠柳浪”与长安灞桥和杭州西湖的苏堤比美，每年春天，风摆柳枝，水欢影动，成为古城一大景观。诗中吟唱的是窑沟渠，也叫永利渠，位于两当县城关镇香泉村庄旁，以渠为界北面为香泉村，南面为城关村。永利渠源头在香泉寺以西的两山交汇处，由西至东。每逢秋夏，经常是暴雨成灾，给县城内和香泉村的百姓造成极大的损失。水患在乾隆年间最为严重，适值秦武域在任之时。乾隆版《两当县志·志地第一·山川》记载：

“永利渠：北一里。乾隆三十二年，知县秦武域因窑沟水发，民多被患，因相地捐修成渠。”道光版《两当县新志·卷之二·山川·景物·古迹·陵墓附》：“永利渠：北一里。乾隆三十二年，知县秦武域因窑沟水发，民多被患，遂相地捐修成渠，立有碑记。”《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三、四》（光绪十五年版）：“乾隆三十年五月十二日，两当县暴雨，漂没人畜无数，水冲入城，坏文庙坊及泮池，居庐街房淹没无数。”《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两当》（光绪十五年版）：“城北有社稷坛、厉坛；北一里有永利渠，乾隆三十二年知县秦武域开浚以御水灾。”秦武域《新开永利渠记》“当夏秋际，猛雨时行，水辄肆奔，为田庐害，乾隆乙酉为甚。”从以上历史资料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两当县城水灾之害，窑沟渠水患的严重。

“余于丙戌来摄是邦，职当除害兴利，因步履其地，集二三父老而语之曰：此方山围水澄，木欣花媚。若庐于斯、田于斯、聚族于斯，既安太平之福，复享林泉之美，乐可知已。且平畴云连，木嘉苗良。”秦武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城北为根除水患而亲自查看地形，并与当地乡绅相商开挖渠道事宜，礼贤下士，陈述利弊，劝民集资，兴修水渠，历时一年，花费银两三十二万两，其中乡绅捐助十三万两，开挖水渠长826米、宽4.5米，又在窑沟渠两边栽植杨柳成行，渠水灌溉土地40亩。防洪渠完工后秦武域亲自取名叫“永利渠”，并撰写碑

文。乾隆三十四年（1770年），知县宋瓚请帑监修完固。《甘肃新通志·卷六十之职官志循吏中》（宣统元年版）：“秦武域，山西曲沃举人。乾隆三十二年任两当，初下车，周阅城垣，慨然有城已恶之欢，遂请款重修，人乐趋公，工将竣，而复调任，后任乐平举人宋瓚踵成之，县人为勒碑记其事。”《两当乡土讲义·第一章·七·山川》：“永利渠在城北，清乾隆时，知县秦武域沿渠筑堤，以防水患，两傍植以杨柳。春则鹅黄长托，夏则雪浪兼天；不殊苏堤之晓景，何减壩岸之风光。此八景窑渠柳浪之名所由得也，今则此景已毁兵燹之下矣！”永利渠碑刻，现存香泉寺内，从碑文中可以看出修建永利渠给百姓带来经济利益，也打造了一个宜居宜游的环境，“窑渠柳浪”也由此成为“两当八景”之一。如今，“窑渠柳浪”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永利渠至今仍在使

二、重视地方建设，关注民生，发展经济

秦武域制订“山地宜椒，妇亦有学蚕者。予欲于川中植桑，山畔种椒，履为邑人劝”^②等经济规划。高仲在乾隆版《两当县志》原跋中：“苏文忠公曰：‘为官而治中有名山胜水、奇花异草，不为表扬，事虽无关得失，然亦有司者之陋也。’旨哉言乎！其期有司者厚矣，况於邑之兴废、沿革、政事、人物，讵可任其泯没无闻邪。”真实地记录了秦武域的施政理念，即立足实际，发

展地方经济。在县城建设方面，修建君子亭、皆山堂、寅宾馆、常平仓、东庙，添建新廨三十一间。乾隆版《两当县志·志地第一·名迹》：“君子亭县署西面，亭为芙蓉池，知县秦武域建”“皆山堂寅宾馆内，知县秦武域建”；《志地第一·衙署》：“寅宾馆，在北街，知县秦武域捐建”“库，在大堂东。……三十一年，知县秦武域增建三十间，额存量四万”；《志地第一·坛庙》“廨神庙·东仓（街），知县秦武域建”“节烈祠，西街。乾隆三十二年，知县秦武域建”。道光版《两当县新志·卷三·建置》：“县城：前代无考。其外东为土地祠，祠东为仓院，有廨神庙，知县秦武域建，西为仓院，西南为寅宾馆。题额皆山堂，知县秦武域建”；《卷三·建置·仓》：“常平仓：大堂东西各三间。三十一年，知县秦武域增建三十间”；《卷三·建置·寺观·附·廨神庙》：“东庙，知县秦武域建”“县署……其外东为土地祠，祠东为仓院，有廨神庙，知县秦武域建；西为仓院，西南为寅宾馆，题额皆山堂，知县秦武域建”。《秦州直隶州新志》（光绪十五年版）《卷之二·两当》：“西仓西南为寅宾馆，皆知县秦武域建”“仓，三十一年知县秦武域增建三十间”。由以上历史资料可知，秦武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勤政建设，对两当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三、振兴教育，重视文化，修建文庙、启圣祠、戟门、文昌宫

乾隆版《两当县志·志地第一·学校》：

“……三十二年，知县秦武域修戟门及棂星门、照壁。”道光版《两当县新志·卷三寺观》：“文庙：在西街，南向。……三十二年，知县秦武域修戟门及棂星门、照壁，称缮完备焉。”《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两当》（光绪十五年版）：“文庙，上为大成殿，左为崇圣宫，台下东西两庑各五楹，前为戟门，后为泮池，左为名宦祠，右为乡贤祠，前为棂星门，外东西门二、坊二，左为节烈祠，未详所始，明末毁于盗。三十二年知县秦武域修戟门、棂星门、外垣。”训导高仲在乾隆版《两当县志》原跋中，这样写到：“岁丙戌，公来治两当。甫接见，即以振兴文教为事，爰颁韵格，示墨式，复为经营庙学，奖励月课。匡我不逮，加惠实多。乃者簿书稍暇，独掺班管，斋心编次，锲邑乘以垂不朽。将使凋残僻陋之区，渐识文物，即山川草木，大为吐气。以视文忠之言，庶无愧色也乎！其它浚渠设馆，已著成效。从此善政毕举，乐只兴歌。知异时，事业彪炳，即基於此，公其懋哉！”屠文焯在乾隆版《两当县志》原跋中：“不宁惟是，侯之来五日京兆耳，而修学宫、武庙，开永利渠，建寅宾馆。凡诸有利兴之，有弊革之，日无宁晷，而又使山僻小邑，有籍可稽，侯之嘉惠於此邦者不为少矣。”以上跋文，如实记录了秦武域兴修水利、振兴文教、经营庙学等方面的政绩，高仲、屠文焯二人在原跋中，虽不乏溢美之词，却也真实地反映了秦武域在任期内，改善民生，振兴教育，教化乡

民，兴利除弊。袁枚评价秦武域：“视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则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③官爱民，民爱官，秦武域一心为民，也赢得民心，是地方父母官的典型范例。

四、重视资治存史，修志问道，纂修《两当县志》

康熙版《两当县志》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两当知县武国栋纂辑，未刊印，为数十页手抄本，简单记录了两当县的历史沿革、山川人物、灾祥等，是现存最早的《两当县志》，今藏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寄语有心修辑者，武功灵寿两堪师”^④，这是七十多年后，即道光十六年（1836年）两当知县莫荣新翻阅秦武域纂修《两当县志》时所作诗歌，高度评价和赞誉了秦武域对两当历史文化的贡献。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知县秦武域、训导高仲、典史屠文焯修成《两当县志》为两当有史以来第二部县志。秦武域在《两当县志》弁言云：“两当蕞尔邑，得名最古。昔读工部诗，有《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一篇，意其地，名流托迹，景物特胜。丙戌秋，来摄是邦，询载籍，称缺焉，余心志之未遑也。今年长夏，政颇清，因搜罗而缀辑之寥寥数幅，略资考索，亦聊以塞风尘吏之责欤！至于人杰地灵、名流蔚起，絺绘山川、平章人物，当有康武功、陆灵寿其人者。是编仅成骈拇，余兹愧矣。”康熙版手抄本《两当县志》为四卷，即志言，有志地第一、考名、疆域、城

池、山川、名迹、八景、学校、衙署、坛庙、园墓、建置、官师、户口、田赋、风俗、物产、祥灾、职名、选举、列传、寓贤、乡宦、封赠、乡耆、列女、志言第四、记、序、诗。乾隆版《两当县志》在康熙版《两当县志》的基础上增加了志言、名迹、学校、坛庙、园墓、田赋、风俗、物产、职名、列传、寓贤、封赠、乡耆、列女、记、序、诗。对两当得名、梁泉县故址、黄花县故址、木瓜张公等进行了考据，对两当地理的编纂细致，更为丰富详实，更加注重地方的治理与教化。秦武域在《笑竹集》中《留别两当父老十截句》之四云：“鹿豕与游木石居，民淳怀葛定何如。輶车所指陈风土，太史应凭五卷书。”自注“两当无县志，予纂辑成五卷。”^⑤乾隆版《两当县志》尽叙两当历代沿革、山川地理、政治风云、社会变迁和文化兴衰，对于了解和研究两当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如秦武域在乾隆版《两当县志》原序中写到的，“志犹史也。国有史，则一代之典章文物彪炳宇宙；县有志，则一邑之风土人文流传千古。志纂重哉！属在风尘吏，率勤斯役。”这是编纂史志的真实写照，既让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彪炳千秋，流芳百世，也使得编纂地方志书、传承民俗文化成为古人和今人共同的历史重任。

五、纵情山水，寻幽探奇，在两当创作了许多诗歌记文

“细绳其诗，于五古又有学陶学韦者，

于七古又有仿韩仿苏者，于五七律绝句，则采群卉之英，集众腋之裘也。及阅拟古乐府，则又浸湜于汉京矣。因叹其才其情，殆前人所谓始于兼，故其体备者。西北诗人不能不为秦君首屈一指。”^⑥兰州知府郑王臣如是评价秦武域才学。秦武域自言：“余于五言宗陈思，于七古、七律宗杜陵，惟五律与绝句，则出入六朝三唐，无常师也。”秦武域执政两当期间，无论是在案牍劳形，理政之余，还是官场失意，都痴迷于寻幽探奇，徒行于沟壑之中，跋涉于山野之间，以最大的热情和爱慕歌咏治辖内的美景佳境。“山城五月最悠然，柳涨浓云幕绿天。佳日春秋一时并，早听莺语暮听蝉。”秦武域笔下如此美丽的《山城》，身在其中，今天依然让人感受到两当的靓丽景象。秦武域在两当期间创作诗文近90篇，涵盖自然风光、名胜古迹、人文景观、民俗风情，无论是数量、题材、思想内容，抑或是艺术风格，都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特色，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迹，他笔下的花团锦簇、山明水秀，已是当今两当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

其一，秦武域笔下的“两当八景”诗。秦武域纂修的《两当县志·志地第一·八景》：“景何必八，求其可名者，约略得之，聊以从俗云尔。鸞鷲仙山、琵琶秋水、天门锁云、乳洞飞雨、窑渠柳浪、故道松涛、镜峰捧日、香泉印月”。在任时，写下了名闻遐迩的“两当八景”诗，兹摘举如下：

鸞鷲仙山

闻说仙翁有旧坛，参差玉笋凤笙攒。
千年鹤影青山寂，万树松阴白日寒。
雨溜新苔鸣石鼓，云封古鼎埋金丹。
人问袞袞何为者，一啸孤峰大地宽。

天门锁云

天门崢嶸望中分，叠嶂纷披五色云。
香惹九重烟磬键，瑞浮双阙气氤氲。
高吞日月中央见，横走雷霆下界闻。
我欲狂歌骖白鹿，凌空上叩玉宸君。

镜峰捧月

煜爚曦光射翠薇，玲珑忽透有圆晖。
云边合璧镜初托，天上重轮花作围。
丹凤栖时春树晓，山鸡舞罢彩霞飞。
试看仙掌高擎处，何事鲁阳戈一挥。

其二，农事诗。“我本当年一小农，只因薄宦欠躬耕。今来归养无他事，依旧青山陇上行。”秦武域在《小农》中道出了自己出身农家，他是封建社会耕读传家之典范。正因为如此，秦武域关注农事，关心百姓，“倏而农歌，倏而樵唱。”《苦雨》《旱》《前题》《临明甘雨》（四首）、《雨坐》《雨不至城中作》《前题》（二）、《书怀》《老农》《小农》《麦秋》《时鸟》（六首）等，诗歌中无不流露着秦武域对治下黎民百姓的关爱情结，既关注了季节的变化，又在农忙时节替百姓欣喜与担忧，深切期望治下的百姓岁丰

熟，民安乐。

时鸟（一）

陇上坡头麦正青，便劳时鸟早叮咛。
旋黄旋割分明语，更比催耕韵可听。

时鸟（二）

子规声里种田时，川上人家尽把犁。
可喜连朝膏雨足，不愁绿树湿黄鹂。

时鸟（四）

既唤麦黄又唤割，声声高唱震山河。
大田何与君家事，昼夜不眠受磋磨。

麦 秋

好风谁与送南薰，谷鸟传声到处闻。
梅雨几番催稔象，青山望里熟黄云。

老 农

老农个个识天时，每卜阴晴更雨期。
不道村前林木外，鸣鸠噪鹊已先知。

其三，山水诗与纪行诗。《雪朝即事》《夏日即景》《红崖古寺》^⑦《嘉陵银椿》以及笔下的“两当八景”诗歌均属于山水诗的范畴，也就不一一列举。

袁枚《随园诗话》卷六：“陈古渔尝为余诵‘马过闻沙响，拖霜看雁飞’^⑧之句，余甚爱之。后知是曲沃诗人秦紫峰明府所作。紫峰有句云：‘看花须看花盛时，盛时难再花亦知。’^⑨尤妙。”《冬日栈道》（二首）

为袁枚所称道，是秦武域在两当时所作^⑩。

其四，“记”文。秦武域所写作的“记”文在《两当县志》中收录的并不多，乾隆版《两当县志》、道光版《两当县新志》仅有《新开永利渠记》和《皆山堂记》二篇，情文并茂，寓意深远。

《皆山堂记》兹摘录如下：

“吾知斯地斯民与斯堂，日就于新，共优游于太平之宇矣。是丰乐喜雨之流风也，予之筑又乌可以已哉，矧夫山椒半陇亩也。春秋晓夕登于堂，苍翠万状。倏而农歌，倏而樵唱。叱犊犁雨，荷畚拾薪。天时之丰啬，民事之休苦，触于目而会于心，则瞻眺流连，职亦在焉。将有得于柳子之楷法者，谁谓不在于皆山之堂！”

《新开永利渠记》与《皆山堂记》是秦武域修建永利渠和皆山堂的经过与感受，既是他热爱两当灵山秀水之气的展现，也是他在两当时执政理念的真实写照。秦武域在两当时还考证过传说中的黑水县（梁泉县）。道光版《两当县新志·卷之二山川·古迹·陵墓》：“梁泉县故址：南一百里。城郭庙署基址尚存，有泉，南流入沔县，土人呼为黑水县。秦武域按历考诸史，雍州无黑水县名，疑即梁泉也。今则古木参天，密箐匝地。传有山魃迷人，人不敢入。”

注释：

①秦武域：《笑竹集·薇郎集附》“一官悔自误，五载方得归”（自注：以失囚在地

方协缉五年),《甲午五月十二日奉召纪恩敬成三章》。

②⑤秦武域:《笑竹集·薇郎集附》自注。

③袁枚:《重到沭阳图记》“视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则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

④道光版《两当县新志》卷十二·诗:莫启新《阅两当县志》:弹丸蕞尔古如兹,善政流风系我思。江上怀人工部赋,雪中感旧放翁诗。叠遭兵燹遗民少,欲广传闻讨论迟。寄语有心修辑者,武功灵寿两堪师。莫启新通州人,廩贡生,道光十六年十月任两当知县。

⑥郑王臣:《笑竹集序》。

⑦《红崖古寺》:两当县境内有二处红崖寺,秦武域此诗应为杨店红崖寺。

⑧秦武域:《笑竹集·薇郎集附》:摩云关下路,石壁两山开。过马闻沙响,拖霜看雁来。风尘销壮志,慷慨剩庸材。今日还重九,不禁肠九回。

⑨秦武域:《笑竹集·薇郎集附》:梅花有情树,迎春春可怜。点点横斜里,未开将开间。看花须看花盛时,盛时难再花亦知。一夜风吹零落尽,枉却花好知恨谁。

⑩袁永冰:《“笑指行人皆入画,不知同是画中人。”——秦武域栈道诗》。

(作者单位:两当县地方志办公室)

庙学研究

——以两当县为例

张 辉

摘 要：庙学即文庙，古代作为“庙学合一”的场所，受到历代君王和百姓的重视。清顺治年间两当县教谕李冲星撰写的《重修庙学记》，为我们提供了明末清初两当县庙学的规模、政府官员对庙学的重视等信息，为研究两当县乃至甘肃古代教育及教育机构提供了重要的侧面论据。

关键词：庙学 教育 书院 发展

文庙，也称“孔庙”“夫子庙”“文昌阁”，原是为纪念孔子祭拜孔子而建立的。文庙全称“文宣王庙”，明代与武庙关羽庙对应，正式改称文庙。封建社会长期尊孔崇儒，各府、州、县城都建有文庙。关于两当县文庙，两当县各版县志都有详细记载。康熙版《两当县志·公署》载“文庙，因寇蹂躏止存正殿。至于启圣祠、两庑、文昌、戟门、棂星门俱废无存。至顺治年间，知县郎熙化、赵志扑、蒋大震先后续修，庶祀典不致湮没”；乾隆版《两当县志·学校》载“文庙，在县西街。明崇祯七年，遭寇尽圯。国朝历任知县郎熙化、赵志扑、蒋大震、张凤翥、江中楫、三格，教谕李冲星先后修葺。乾隆二十四年，知县本著修启圣祠；二

十八年，训道高仲修大殿、月台及两庑；三十二年，知县秦武域修戟门及棂星门照壁”；道光版《两当县志·寺观》载“文庙，在西街，上为大成殿，左为崇圣宫，台下东西两庑各五间，前为戟门，门外左名宦祠，右乡贤祠，中为泮池，前为棂星门，外东西二门相对，为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坊，左为节烈祠，创建朝代无考。明崇祯七年遭寇，尽圯；国朝历任知县郎熙化、赵志扑、蒋大震、孙兆祯、张凤翥、江中楫、三格，教谕李冲星、王恂相继修建；乾隆二十四年，知县本著修崇圣宫；二十七年，训导高仲及绅士捐资共修大成殿月台及两庑；三十二年，知县秦武域修戟门及棂星门照壁，称缮完备焉”。

从各版县志看，随着时间的变化，对文

庙的记载越来越详细，各任知县、教谕对文庙都非常重视，他们或重修、或增修，使文庙的体制规模不断扩大，充分显示了两当官府对庙学的重视。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庙特别是两当县文庙展开论述：

一、文庙的历史地位及功用

文庙之于国家，是统治者用于稳定统治、传达思想、发挥教化功能的场所。对于古代知识分子来说，文庙是他们“学习诗书礼仪、出仕做官、光耀门楣的梦想之所”。因此，自北朝以后全国各地大兴文庙。两当县文庙建自何时，无考。两当县庙学同中国所有庙学一样，“庙学合一的体制使历代儒士文人这里接受了儒学的熏陶，尊经读经即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为各个时期培养了不同层次的学人。同时，通过科举考试制度，也为当时的封建社会输入了新鲜血液。”

1. 庙学的定义

对庙学研究最系统的学者是台湾的高明士教授，他系统梳理了庙学历史，指出中国古代教育史就是一部庙学史，而且庙学制度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形成了以庙学制度为核心的东亚教育圈。高明士给庙学的定义，简单说，所谓“庙学”教育制度，指学校以文庙为主轴而展开的儒教主义教育。就是在学校中设有文庙，围绕孔子祭祀礼仪而进行的学校制度。国内学者胡务将庙学定义为“庙学是指依附于孔庙、传授儒家理论为宗旨的学校。”定义反映了庙学的性质，庙学是学校，是传授儒教学说的校园。王军认为“文化传承，是一种文化传递的社会现象。作

为赖以生存和维系的必要手段，文化传承负载着将先人创造和积累的一切文化财富和经验，一代代地传递给后人的历史重任。”

2. 庙学的发展

尊奉孔子的文庙，最初是作为家庙出现的。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鲁哀公忧伤非常。次年鲁哀公瞻仰了孔子的旧居，有感于孔子生前的德风，为纪念孔子于是在其故乡阪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以其‘故所居堂’作为寿堂，当时的‘庙屋三间’，初称‘卫学’，由孔氏族人供奉之，并不带有任何宗教和迷信色彩。这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文庙，而且是将孔子尊崇为‘神’的源头。”文庙有教学职能，开始于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汉明帝东巡回朝时，“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从此，文庙具有了教学职能。“唐贞观二年，唐太宗诏令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于是文庙祭祀之礼逐步完备。贞观四年诏州县皆立孔子庙”，这是地方州县建立孔庙的开端，文庙祭祀制度逐步由京师推广到全国。“武德二年，唐高祖下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此后，庙中有学，学中设庙的‘庙学合一’成为定制。”

3. 两当县文庙的发展及型制

两当县文庙在清朝初年，规模还很小。如果按照文庙建置要求，还远远不合規制。如前文所说“文庙……止存正殿。至于启圣祠、两庑、文昌、戟门、棂星门俱废无存”，到顺治年间，“知县郎熙化、赵志抃、蒋大震先后续修”“乾隆二十四年，知县本著修启圣祠；二十八年，训道高仲修大殿、月台

及两庑；三十二年，知县秦武域修戟门及棂星门照壁”。至此，两当县文庙的规制才逐步完整。两当县庙学与其他地方庙学一样，在清代，经过诸县令、教谕的增修、重建，至道光年间，已经基本确定了文庙的规制。除正殿之外，启圣祠、两庑、文昌、戟门、棂星门、泮池、名宦祠、乡贤祠、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坊、节烈祠等设置一应俱全，前文引用道光版《两当县志·寺观》中已有陈举，此处不再赘述。

二、碑刻反映出的两当县文庙重修历史

两当县有关文庙的修建碑刻记录，在道光版《两当县志》现存有《重修庙学记》《重修学宫记》《重修明伦堂碑记》碑佚，是对史志的补充，弥补了史志记载不详的缺憾。这里对三篇碑记全文标点如下：

重修庙学记

国朝李冲星

文庙宸黻，龙兴屏树，文壁天马，崕岬（山深之状）左右，间古柏苍翠，若环拱而来揖也。其前故道河，一碧数顷，自泮水而西，曲流潋洄，肖泗水之佳致。慨自巢巾煽乱，官署民廛付之楚人一炬，仅存庙学一区耳，危立空城，沦入草昧，岌岌乎其倾圯，血食将坠。不得已，遂迁夫子位于堡楼，上无以称神棲，下无以储生徒。

丁亥腊月，侯来牧是邑，谒神于矮屋，惊顾错愕，即有修建之举。时上夫夫为重地，需材孔亟，借寇者三，未果所愿。庚寅之夏四月，获抵是治，周视庙学，遂集众金谋曰：“庙与学，葺治正在今日，过此则酉金月毕，将归乌有！”先捐俸金数钗，随以

大义勉诸生，愿生徒各将乃心嗣是。日计日谋，不憚其烦；时督时省，不厌其苦。材必取其永久，用必植其坚完。施不拒诸傭作，物不鄙诸细微。前岁七月始事，今四月告成焉。神位几案，肃然毕具。学阶露台，巍乎是崇。丹垣有繚，甬道斯辟。用虽未加乎初，事可聿如乎旧。至踵事而成厥志，其后之君子与诸生，复睹文物威仪，杂然称曰：“庙学久湮草莽，一旦神明妥矣，圣道崇矣，侪辈苟能蓄其业于有永，大以襄朝庭，广以隆祀典，久安长治，夫天下将在斯欤？是可无传乎？”轰然砉石，督余记之。余因此笔书焉。侯姓郎，讳熙化，字太和，辽海广宁人。士民颂曰：“节义著武都，事业满陇右。”作史者必书之，余可无志也？第高其修庙学一事，以勒不朽云。

时顺治八年秋八月。

重修学宫记

江中楫（邑令）

先师孔子之庙，自国都以至郡邑，在在俎豆。盖以礼义相先之地，人心于是乎正，风俗于是乎美。化理雍熙，国运昌明，其成效章章可考已。我皇上首重文教，崇庙祀，亲释奠，隆礼已极，所以裨益人心，挽回风俗，举一世而甄陶之，斯足观德化之成也。

康熙己卯冬，余承乏两当，入其邑，城几如斗，居民数十家，合境内较之，仅以千计，萧条之状，不可名言。盖当凋敝之余，民多逃散，求所谓歌乐土而爰得我所者，无有已。谒圣庙，堂止三楹，仅设夫子、十哲之位，于诸贤则缺而未备，愆焉忧之。谓：“居民如是，则殷富不可得而问也；学校如

是，则弦歌不可得而闻也。”欲求补苴，难于速效。频年以来，一切不便于民者，亟除之。催科无扰，五年之间，户口已增二倍。遂经营夫子庙，设两庑以安诸贤。前列戟门三间，名宦乡贤二祠，置于门之两侧。棣星门外泮池，以木栅护之；其东别立三楹，为启圣祠。西三楹为明伦堂，堂前建二门、大门。始于癸未之夏，于乙酉冬落成。计钱三十二万有奇，邑绅士共助十三万。重伤一人之力有限，而宏敞其堂、邃深其宇不能也。夫宫墙之内，以道德为干盾，以忠信为甲冑，使诸生入其门，揖让有礼，进退有方。移孝可作忠，能弟可事长，毋趋于浮，毋长其傲，则人心正而风俗美，诂有外于是欤？

昔韩文公治潮，潮人始知学；柳子之治柳，亦然。余何敢希踪二公，而竭蹶其力，焦劳其心，或庶几一得之有合也。故记之。

后之君子宏敞其堂，邃深其宇，与此邦之人鼓舞而振兴之，以无负圣天子作新之化，是则余所深望也夫！

时康熙四十四年冬月。

重修明伦堂碑记

李佩玉（训导）

堂之设，由来久矣。自乾隆戊辰重修后，迄今六十余载，墙颓瓦解，栋折榱崩。余莅任，即有志复修，以岁歉不果。辛未（嘉庆十六年），国公下车视学，睹其状，遂指阶前柏曰：“有此树，以公济公，则一半工费足矣，诂可令大厦之覆耶？”于是定价出售，嗣以请修圣庙，拨项助工，并得绅士乐施。于二月兴工，五月落成。其基前移数丈，而文气更觉团聚；其堂稍减数尺，而体

段亦复宏阔。猗欤！庶几前业克继，学校之观瞻亦壮也。

起者诚能随时补葺，则岂但百年之巩固已哉！至所有树价、捐资及工料之费，悉列于碑阴。

嘉庆壬申年上浣。

1. 《重修庙学记》反映出的文庙重修时间及功能

碑刻记载“前岁（顺治七年）七月始事，今四月告成焉。神位几案，肃然毕具。学阶露台，巍乎是崇。丹垣有繚，甬道斯辟。用虽未加乎初，事可聿如乎旧。”碑文中对重修时间有明确记载，即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起建，至次年四月完工，用时九个月，使文庙规模有了增加，内外焕然一新。碑文对文庙重修后的功能做了概括：“庙学久湮草莽，一旦神明妥矣，圣道崇矣，侪辈苟能蓄其业于有永，大以襄朝庭，广以隆祀典，久安长治，夫天下将在斯欤？”“神明妥”“圣道崇”，体现了文庙的祭祀功能。“侪辈苟能蓄其业于有永”，体现了文庙的教育功能。

2. 《重修学官记》反映出的文庙重修历史及增修情况

此碑刻是时为两当县令的江中楫做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冬月，记载了康熙四十四年官民重修学宫的事件。江中楫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任两当县令，他先拜谒文庙，见“圣庙堂，止三楹，仅设夫子、十哲之位，于诸贤则缺而未备”，在用四年时间使百姓休养生息后重修文庙，“五年之间，户口已增二倍。遂经营夫子庙，设两庑以安诸贤，前列戟门三间，名宦乡贤二祠，置于门之两侧；棣星门外

泮池，以木栅护之；其东别立三楹，为启圣祠；西三楹为明伦堂，堂前建二门、大门。始于癸未之夏，于乙酉冬落成，计钱三十二万有奇。邑绅士共助十三万。”此次重修文庙用时三年“始于癸未之夏，于乙酉冬落成”，增设了两庑、戟门三间、名宦祠、乡贤祠、棂星门、启圣祠、明伦堂等。

3. 《重修明伦堂碑记》反映出的文庙重修历史

此碑刻立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年五月，是时为两当县训导的李佩玉所写。记载嘉庆十六年（1811年）在两当县令国兴主持下重修明伦堂的事件：“堂之设由来久矣。自乾隆戊辰重修后，迄今六十余载，墙颓瓦解，栋折榱崩。余莅任即有志复修，以岁歉不果。辛未（嘉庆十六年）国公下车视学，睹其状，遂指阶前柏曰：‘有此树，以公济公，则一半工费足矣，讵可令大厦之覆耶？’于是定价出售，嗣以请修圣庙，拨项助工，并得绅士乐施。于二月兴工，五月落成。”碑文中有“自乾隆戊辰重修后，迄今六十余载”，乾隆戊辰年是乾隆十三年（1748），此年重修了明伦堂，距离嘉庆十七年（1812年）重修已有64年了。

从现存三通碑刻记录内容看，两当县文庙重修基本贯穿清朝数个皇帝当政时期：顺治年间“知县郎熙化、赵志抃、蒋大震、孙兆祯先后续修”，康熙年间“知县张凤翥、江中楫、三格相继续修”，乾隆年间“知县本著、秦武域等”续修。有记载的修建历史只是一部分，不乏县志、碑刻没有记载的重修。

三、官府在文庙重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文庙作为中国古代“庙学合一”制度的载体，是官府的组成部分，它既是祭祀先圣的文庙，又是官府培养人才的庙学。“纵观中国文庙发展史可知，中国文庙因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使得修建文庙与祭孔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重大的文教工程，因而文庙的建造工程一直倍受地方政府的重视。除了曲阜孔庙与北京孔庙两座具有国庙性质的文庙，其他地方文庙的修造工程一直由地方政府主导。”两当县文庙的修造工程，也一直由官府主导，如前文乾隆版《两当县志·学校》记载的“文庙……国朝历任知县郎熙化、赵志抃、蒋大震、张凤翥、江中楫、三格，教谕李冲星先后修葺。乾隆二十四年，知县本著修启圣祠；二十八年，训道高仲修大殿、月台及两庑；三十二年，知县秦武域修戟门及棂星门照壁。”两当县文庙基本都是在当地最高官员的主持下，或主管教育的教谕，或教谕被裁撤后的训导具体负责修建的。

《重修庙学记》记载的就是在当时（顺治八年）县令郎熙化的主导下，教谕李冲星具体负责修建庙学的过程。《重修学宫记》记载的是当时（康熙四十四年）两当县令江中楫亲自督建文庙的过程，并且亲自写了重修碑记。《重修明伦堂碑记》记载的是当时（嘉庆十六年）两当县令国兴主持重修庙学的过程。这三篇碑记共同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每次庙学重修都是在官府主持下完成的，体现了两当县官府对庙学的重视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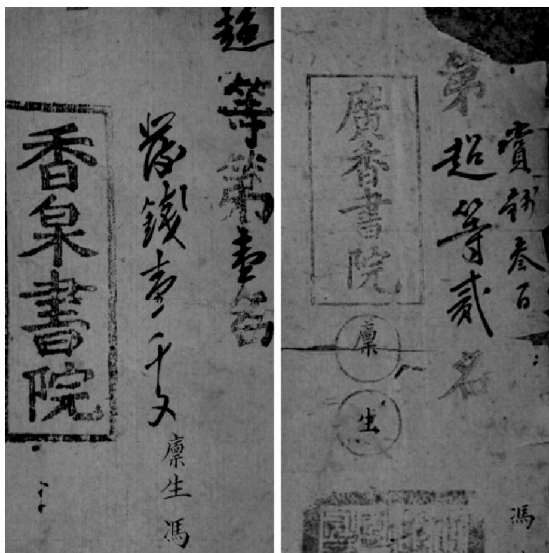
四、士民在文庙重修中的作用

文庙重修过程中，士民也起着重要的作

用。每次重修活动，虽赖官府主导，但士民踊跃捐资出力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在教育意义下，孔子以及先贤，藉庙制将知识与教育的权威性提升至神格，以超越世俗的王权。这种神格是知性的，是人间的典范，供士人学习、效法，将来甚至亦可并列圣贤。”士民在这种目标的激励下，焕发出极大地热情，在庙学重修中士商农工都“量力捐资，共勦盛事”，庙学重修碑记在记事之后都有捐资人姓名及所捐钱数目，让后世之人铭记前人功德。每次重修记事碑上，都有上百人和许多商号的名称，历朝历代的“士民”无不在庙学重修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五、两当县庙学教育与书院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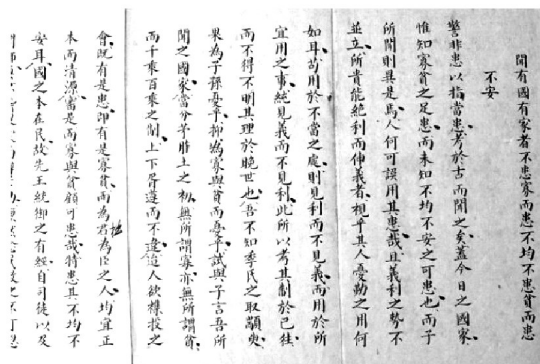
1. 两当县现存书院



两当县庙学与全国各地庙学一样，由于规模制约，不能全部承担起对学子的教育任务。于是，民办书院越来越受到官府重视，他们以科举为目的创建或修复书院。两当县的广香书院在嘉庆道光年间颇受重视。嘉庆年间，两当县令周邦倚做有《新建广香书院

碑记》。文中修建广香书院的原因是两当县科考中举着乏人，“国朝来举于乡者仅二人”，表明了“庶乎教养兼备，礼乐之兴，几于刑措”的愿望。道光年间，两当县令德俊做《续捐增广香书院山长伙食碑记》，表达了对周邦倚县令重视书院教育的继承“以副周公之深为冀望”，提出自己对广香书院的期望“若贤材而时出，更予之所乐与观成者也”。贡生韩塘颇受县令德俊器中，使其“主广香书院讲席”，并“多士钦服”，同时“邑令德俊重修县志，资采访，艺文多出其手。”（《甘肃新通志·卷六十七之人物志群材二》（宣统元年（1909）版））。两当县有记载的书院，除了广香书院之外，还有香泉书院。邑人史诚直在《香泉寺记》中有“而予师闇翁教学于此，亦尝有示诸生之作”，说明史诚直的老师“闇翁”就曾在香泉书院教学授课。

2. 两当县书院对庙学的补充作用



盛朗西在《中国书院制度》一书中云：“清之书院方式，大别为三：一为讲求理学之书院，一为考试时文之书院，一为博习经史词章之书院。”现存广香书院和香泉书院学子的月课试卷均为应试科考的八股文体，说明广香书院和香泉书院都是“考试时文之书院”。两当县历任县令对书院教育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庙学的压力，为两当县教育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也为两当县读书人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平台。

3. 挖掘文庙及书院的文化教育价值

两当县文庙（今城关小学院内）现今只余大殿一楹，广香书院已经基址无存，香泉书院的痕迹荡然无存。作为两当县古代教育的主力军，我们应该挖掘文庙和书院历史文化价值，把它们作为当地文化教育中心，在文庙所在地“开展国学讲堂、建立收藏馆，为人们提供更多了解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将文庙作为传播儒学精华的教育基地，对大众尤其是中小學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他们本土文化认同感、民族自信心、民族责任感，使他们具有‘仁爱’‘忠信’‘平和’‘孝悌’等优秀品德，充分发挥文庙在当代的教育价值。”让两当县广大学子充分认识和了解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培养他们爱家乡、爱祖国的美好道德情操。

参考文献：

[1]吉丽娜：《山西文庙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1（6）：10、3、6、9、8、10。

[2]高明士：《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M]，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1—2。

[3]胡务：《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1。

[4]王军、董艳著：《民族文化遗产与教育》[M]，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07：3。

[5]申万里：《元代文庙祭祀初探》[J]，台湾：暨南大学出版社《暨南史学》第三辑2004（12）：25。

[6]柳雯：《中国文庙文化遗产价值及利用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4）：31。

[7]田增志：《文化传承中的教育空间与教育仪式——中国庙学教育之文化阐释与概念拓展》[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3）：32。

[8]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民国丛书》第三编）[M]，上海：上海书店，1991：154。

[9]齐月凤：《河南文庙遗产保护和利用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13（4）：11—12。

（作者单位：两当县第一中学）

对“文史互生”现象的探究

王长华

编者按：历史是史学与文学的共同对象与主题，文学重在表现历史真实，史学则既要再现历史事实，也要表现历史真实。清代著名类书《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史学和文学就是其中的两部分。二者关系千丝万缕，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已成一种不成规矩的定律。

“文史不分家”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一部真实可靠的史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传记；反之，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真实的历史记录……这其中，以历史的严谨规范文学，使文学避免了随意和臆造；用文学的手法书写历史，使历史脱离了抽象和枯燥，双方相得益彰，各臻其美，相互生发，相互印证。

一、《诗经》，先秦史料的宝库

文学和历史密不可分的现象，在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中，就体现的非常突出。从《诗经》中不但可以看出周代的民情风俗和政教设施，而且还可以得到许多历史资料。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可见，诗经与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在诗经里，有许多叙述历史故事的文章，写得生动详尽，成为后世史料的宝库。

隋代思想家王通在《文中子》一书中

说：“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然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因此，我们从《诗经》中获知：周代自其始祖后稷，到灭商的武王，经过了一段非常复杂的奋斗过程，在《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三篇讲述的很清晰。

《生民》，可说是一篇生动的《后稷传》。在这篇传记中，叙述了后稷的初生，及其如何从事农业生产的故事。最初，后稷的母亲生后稷后，唯恐孩子不吉利，就把他丢弃在野外，“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訐，厥声载路。”就这样简洁生动地叙述了后稷一生下来，总是历诸难而不死，是由于牛羊乳他，鸟翼护他，自然灵异不凡，于是得以养成。

这显然是利用了当时的神话传说的素材作为底本。后稷生下来，就有会种植五谷的才能，及长成人，便倡导农业，于是瓜果豆麦，无一不备。诗中用丰富多变化的形容词，描写了后稷所种农作物的茂盛和美好。后在有邰地方（今陕西武功县）成家立业，建立周民族的基础。

后稷的曾孙公刘，是周民族中有名的英雄。《公刘》篇中说，他在邰地时，继后稷之业，努力生产，率领人民荷着食粮、兵器，向远方开疆拓土。最初是由邰到胥，经营耕种。后到百泉，不久又到豳谷，在那里定居下来，产业人口，日益繁盛，公刘成为部族的领袖，开始建宫室，练军队，定田赋，形成了国家的规模。《公刘》中表现出群众的欢乐情绪和劳动精神，宛然在目，说人民初到豳地的情况是“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在《绵》中，讲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古公亶父，因受到戎狄的骚扰，由豳再迁到岐山下，即今陕西岐山县。据《史记·周本纪》上说，这次的迁徙，规模庞大，“举国扶老携弱，尽归古公于岐下。”古公亶父，史称太王，是王季的父亲，文王的祖父。周民族自公刘以后，似有中衰之象，到古公亶父，又逐渐复兴起来。全诗叙述他迁居到岐下，一直至文王受命的历史。古公亶父从豳迁到岐山下来，同姜女（太姜）结婚；见岐山下土地肥沃，于是筑室定居，从事农业；因情势利于久居，古公亶父大修宗庙宫室，委任官吏，在岐下创业；建国灭夷；文王受命。诗中“捄之陟陟，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

屡冯冯。百堵皆兴，鼙鼓弗声”的描述，将当时群众建筑的情况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表现出浓郁的气氛及文学技巧。

《大雅》中的《皇矣》篇，歌颂文王伐密、伐崇的两次战绩。《大明》篇，记述武王的灭纣，这些都是周代史诗的佳作。其次，《崧高》写申伯，《蒸民》写仲山甫，《韩奕》写韩侯，《江汉》写召虎，《常武》写南仲等，都是零星的宝贵史料。在《小雅》中，有记载当时战争的史诗，《出车》篇，记厉王时南仲的征伐玁狁（我国古代先秦时北方的少数民族）；《采芣》（野菜）、《六月》诸篇，大都是记述宣王时代，同蛮荆、玁狁、淮徐诸部落战争的事迹。在《商颂》的《玄鸟》篇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话，是指简狄因吞燕卵而生下商朝始祖契的灵迹。《鲁颂》中的《閟宫》，叙述太王（古公亶父）翦商，周公封鲁，僖公复周公之土字的事情，也都是富有历史性的诗篇。

二、《史记》，无韵之《离骚》

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分法中，《史记》被列入史部。《史记》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制相互补充而形成完整体系的编纂方式，成为封建时代各朝修史的范本。同时，也是一部百科全书，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宗教、学术、民俗、科技、医学、民族、天文、地理、文学等方面总结了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

六朝以来，学者多从史学、文学两方面评价《史记》。至鲁迅先生，概括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是就《史记》的文学成就而言。屈原的著名

爱国杰作《离骚》是押韵的长篇抒情诗，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意味着《史记》虽不押韵，却是堪与《离骚》比美的抒情性较强的长诗，即今人所说的散文诗。这种评价，准确深刻。司马迁从史的角度吸取了《离骚》的审美理想和抒情特色。

《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以人物为中心展现历史画卷，从而塑造了许许多多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其选择、剪裁、集中材料和表现人物心理、性格的各种手法、技巧，对此后传记、小说、戏剧乃至叙事诗的创作有深远影响。《史记》中的人物、事件，有不少也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题材。《史记》集先秦散文之大成，又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唐宋散文八大家及其同时和以后的散文家，无一不从《史记》中吸取营养。这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但作为历史著作，又杜绝了虚构的成分。

《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法，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从其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侧重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在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

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因此，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信陵君列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廉颇蔺相如列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孙武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臧传》包含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且除《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简陋很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

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但是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史记》以人物为本位，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司马迁通过运用人物互见法和事件互见法，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上述两书都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体来看，在汉代以前，没有完整的人物传记出现，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比较简略。《史记》中的人物塑造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

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使这些人物形象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读者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这一点值得后来的历史传记学习。

司马迁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量抄录。

在历史和文学的有机结合方面，《史记》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愧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三、诗史，诗歌具有“史的质性”

在诗歌中，将诗与史融合在一起的，应该首推杜甫。唐代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一条大段引诗叙述李白在长安及宫中故事，近尾处涉及杜甫，说：“杜所赠二十韵（按：指以“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开头的五排《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又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什么是“诗史”？怎样的诗才能算得“诗史”？孟棨从杜甫赠李白诗联想到他遭逢安史之乱，晚年流落到陇蜀一带，其诗反映时事和生活经历全面细腻深刻，故时称其为“诗史”。孟棨只讲述事实，并没有给“诗史”下定义，后人根据这段话来解释“诗史”的含义，也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

“诗史”是对某首诗或某个人的一些诗篇内容的深广和思想艺术高度的一种肯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与“史”比一般文学创作的地位要高，如果说一首诗或某人的诗具有“史的质性”“史的意味”因而堪称“诗史”，无疑是对此诗的极高评价。说杜甫是“诗史”，特别是他写于安史之乱期间的那些诗是诗史，应该说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的。

上海大学文学院董乃斌则提出了另一种对于“诗史”的看法。诗史可不可以有多种写法呢？杜甫是一种写法，写的是下层生活，颠沛流离，衣食无措，家破人亡，现实

性很强，甚至有不少新闻报道式的描写记述琐事和细节，生活气息浓郁。然而，诗史是否只能用此一法呢，像李白那样写，能不能够称作诗史呢？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说李白的《登高丘而望远海》“九十一字中有一部开元天宝本纪在内”。

受王夫之启发，我们对所谓诗史，有了更为开阔的眼界。叙述记录了许多当日生活细节、在时光流逝中具有历史认识价值的作品，杜甫的诗可称诗史；写出了历史的氛围和动向的作品，李白的《登高丘而望远海》，也是诗史的一种。甚至比李白的诗思更超脱、更浪漫、更大胆，比李白的诗表现得更天马行空、更幽深隐微、更匪夷所思、更独特而出格，而实际上仍不过是现实生活抽象的作品，也能够因具有史性而堪称诗史，李贺的一些诗便是此类。因此，可以说认真表现生活，无论表现的是生活细节，还是生活感受，是百姓的柴米油盐，还是民众的喜怒哀乐，就都有可能触及生活的腠理、社会的脉搏、历史的足音，在或长或短的时间以后，被发现并被承认为“诗史”。

李白杜甫都不是只有一副笔墨、只会写一种风格诗史的大家，堪称诗史的作品表现手法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杜甫除了孟棨所说“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式的诗史外，也有《兵车行》《丽人行》《哀王孙》《哀江头》新闻报道式的诗史，“三吏三别”式小说戏剧型的诗史，有《秋兴八首》结构谨严富于哲思的组诗式诗史。李白则既有《登高丘而望远海》《古风·一百四十年》俯瞰宏观式的诗史，也有《古风·胡关饶风沙》《古风·

羽檄如流星》《古风·大车扬飞尘》直接反映现实问题的诗史，有《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把自叙生平和记载时事相结合的诗史，还有充分表现其思想矛盾、既渴望远引高蹈又实在离不开华夏热土的《古风·西上莲花山》式诗史。高岑、元白、韩柳诸位的诗集也同样是诗史，一部《全唐诗》则是有唐三百年波澜起伏的宏伟诗史。

诗史，是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一种现象，诗史也是诗歌的一个类别或品种。诗歌不会都是诗史。诗史是诗歌中渗透了史性、史识、史意、史味的部分，但它的本质还是审美的。它和史在本性的最深处相通。

四、元杂剧，文学对于历史的超越

综观元杂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其选材角度讲，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窦娥冤》《鲁斋郎》《陈州糶米》《救风尘》《望江亭》等。作者把故事发生的时间上推至北宋或金朝，但实际上作品中反映的是当时的现实。第二类是取材于历史事实或传说，《单刀会》《李逵负荆》《霍光鬼谏》《汉宫秋》《梧桐雨》等。这些剧写的是历史上实有的或传说的人物和事件，有的颂扬英雄主义，有的颂扬扶弱锄强，有的表现宫廷生活……给身处元代统治下的广大人民以极大的启发和教育。第三类是取材于传奇、志怪、话本、笔记，《西厢记》出于《莺莺传》，《黄粱梦》出于《枕中记》等。作者根据现实生活进行了再创造，从而使这些题材获得了新的生命。

学者罗锦堂对于元杂剧的文学成就给予了

高度评价：“元代杂剧盛行，作者辈出，其所写范围，涉猎颇广，举凡历史之伟迹，市井之琐闻，英雄风云之气，儿女眷恋之情，兼收并蓄，尽态极妍。其体物之工与写情之妙，沁人心脾，爽人耳目，远非当时渐趋衰败之诗词所可比拟，故能代表一代之文学而睥睨千古。”罗锦堂将元杂剧分为八种类型，其中“史实”与“文学”相互印证，相得益彰，统计历史剧就有35本。并指出，“元人杂剧之题材，往往以史传为本，然并非直接引据，而系间接改编。盖当北宋之际，说评话之风甚盛，而讲史为其大宗；南渡以后，讲史之风，盛于昔日；依其性质之不同，分为两项，以历史事迹为主者：凡十五本；以个人事迹为主，而其事迹与史事相关联者，凡二十本。”此类杂剧，因多依据史书载籍，尚不至于荒唐无稽。有不合乎历史的，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因处理材料之便利，而稍事增损。二是为表现某种情调或意义而变动史实，《气英布》意在表彰高祖用人之智略，《西蜀梦》意在褒扬关张之高义，《小尉迟》意在说明父子之情感，《霍光鬼谏》意在称道重臣之忠贞，《东窗事犯》意在责叱权相之奸佞皆是。三是作者身处乱世，愤世嫉俗而玩世不恭，故为荒唐谬悠之说，以泄愤寄慨。因元代法令：“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一般失志功名之文人，满腔牢愁，不敢率直明言，形诸笔墨，乃影借史籍，抒其抑郁。因此，元杂剧在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是“以史传为本”“然并非直接引据，而系间接改编”。也就是说，元杂剧在

“史”与“文”的关系上，既来自于“史”，又超越了“史”的拘束和限制，实现了“文”的超脱和腾跃。

《汉宫秋》，作者马致远生当元初，睹南宋灭于元，文治不修，武功不振之故；而又身受蒙古人之压迫，一腔愤恨，无从发泄，乃借王昭君之事以舒其胸臆。作者自居于汉元帝之地位，以天子之尊，而不能保其所爱，拱手送人，于痛处下针砭，语重心长。箕子睹麦秀渐渐而痛伤殷之亡，周大夫见彼黍离离，而慨叹周之迁；致远心境，正与此同。故于昭君事实，不得不略有变更。所变更者，元帝未尝前见昭君，而戏文则谓既已见之，复又幸之矣。盖藉此以强调割离之痛，和番之辱也。昭君嫁单于，生有子女，而戏文则谓其投水自尽；呼韩邪实以郅支既诛而求亲于汉，戏中则谓其国力强盛，汉不能敌。盖不如此，不足以发泄弱国小民之满腹牢骚也。元剧作者，往往如此，若比执正史以责其谬，迂矣。这种历史剧是文学对于历史的超越。

五、历史，在小说与“戏说”之间如何平衡

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无论文学家怎样发挥文学的创造，但自始至终总难以掩盖历史。但对于历史是巧妙应用还是任意发挥，都会影响到这类创作的得失成败。历史小说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历史事件的演绎传达出作家独特的历史观、文学观与美学观。

王守义的长篇历史小说《奄吞秦汉·隋炀大帝》（作家出版社2016年）迥异于过去历史文献和已有文学文本对隋炀帝形象的建

构，重塑了一个全新的帝王形象，显现了隋王朝的政治风云、社会风貌与文化风景，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源远流长、色彩斑斓的丝路文化。兰州大学文学院郭茂全认为，隋炀帝历史身份的复杂性、历史评判的驳杂性与性格才情的多面性给后代作家留下了巨大的言说空间。历史叙述中的文学想象与文学想象中的历史叙述相互交融，“大写历史”“小写历史”及“复写历史”相互渗透，使得作者对隋炀帝的多元化历史书写与诗意阐发成为可能。在历史诠释与文学诠释的双重视域中，历史人物本身亟待一种多元化书写。王守义历史小说的写作不同于对帝王同质化的摹写，作家在重塑隋炀帝中不仅完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双向对话，还建构了自我与人物的双向交流。

一些学者将历史小说按发展阶段划分为传统历史小说、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三种类型。传统历史小说以传播历史知识、反映历史真实为创作旨归，现代主义历史小说探寻历史的本质性和可知性并展开历史与当代的对话，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突出历史的虚构性、碎片化及多重可能性。

作者对历史的书写都需要在把握历史脉息的前提下尊重历史、充实历史、提炼历史、复活历史，需要站在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立场上，恢复历史应有的面目。《奄吞秦汉》采取了“非贬即褒”的叙述立场，这种立场明确显现在小说的“前言”部分，反映出王守义历史小说创作的理想主义美学追求。当然，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即使重塑历史人物成为可能，也会限制作者对历史人物

本身复杂性的深入开掘，限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悲剧、人物命运悲剧及性格悲剧的全面思考。作者在《前言》中为隋炀帝颂功德、鸣不平，但事实上无论哪朝哪代、哪个机构、哪个个人都没有也不可能给隋炀帝做出最后的结论，为其他定案。自古以来，隋炀帝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强调他的功绩，有人强调他的罪过，角度不同而已，严肃的史学家并没有对他做过全盘肯定或彻底否定。《资治通鉴》中记述了隋炀帝的重大作为，筑长城，遏胡寇，开运河，演地图，通西域，张掖交市，和睦民族，清查户口，造《大业律》十八篇，派人出访，郡置守、县置令，废伯、子、男爵，灭琉球，伐高丽等等。对于隋炀帝的罪过，司马光则是通过引用隋朝将领马文举对隋炀帝的反问来表达的，马文举说“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侈，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隋炀帝道“我实负百姓！”真实的历史小说，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为了让读者信服，包括细节和语言都不能超越时代，否则就成了戏说。本书作者要塑造一个完美的杨广，却导致了书中杨广的不完整，不是一个全面的真实的杨广。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作品又能使读者得到多少益处。

小说，就题材而言，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纪实的，一类是虚构的。当然，纪实类小说中也有虚构成分，但其主要人物、主要事件应当是真实的，《三国演义》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但有不少虚构，诸葛亮摆空城

计，关公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等，有人说它是“七实三虚”。虚构类小说可以是纯虚构，也可以吸收、借用部分的真人真事。

与王守义“非贬即褒”的叙述立场，以及历史小说创作的理想主义美学追求相照应，熊召政的话剧《司马迁》，则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作家“参与改革，拥抱时代”的现代意识。历史走到哪里，文学家的笔就跟踪到了那里。这样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是值得今天的文化人和史学家去向往、仿效的。熊召政在谢新文化访谈录中谈到：“所以我在《司马迁》的最后一幕中写到，他和汉武帝在思想、理想与襟怀上的大碰撞，我称之为中国两千年前思想上的巅峰对决。我不是为写古人而写古人，而是反观当下，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和历史来激发我们创业的激情，来激发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我就把我的笔伸到这里去。所以我说我‘参与改革，拥抱时代’，不是喊口号，而是出于作家的本能，用我的笔参与改革的历史。”谁都无权干涉作家创作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自由，但熊召政这一番自述所讲述的正是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一篇成功的历史题材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还是其他，都应该以史为骨骼，以文为血肉，才能经得起时间的磨洗，成为经典。

（作者单位：定西市日报社）

平凉柳湖书院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朱克雄

摘 要：柳湖书院以“鼓舞人才，振兴文运”^①为目的，按照“地灵人杰”的理念及文人对读书环境塑造人格精神的信仰，于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之处，把因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古典园林理念与信仰巧妙的应用于书院建造当中，赋予园林书院精神这一特殊形式。本文在对柳湖书院的历史沿革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其选址布局以及所承载的人文内涵进行探究。

关键词：柳湖书院 士文化 传承 发展

明、清两代平凉境内先后创办了13所书院，在影响较大的7所书院（静宁的阿阳书院、泾川的阮陵书院、庄浪的道南书院、华亭的仪山书院、崇信的凤鸣书院、灵台的鹑觚书院、平凉的柳湖书院）中，柳湖书院颇具特色、最负盛名。目前国内对西北园林特别是陇原书院园林的研究较缺乏，对平凉柳湖书院开展研究，不仅对于我们研究清代西北书院园林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对探究古代书院园林艺术，挖掘借助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发展壮大文化旅游产业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都有着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柳湖书院的历史沿革

柳湖书院位于现甘肃省平凉市。柳湖处于平凉古城以北，定北门外的暖泉城内。平凉城周围有“两河十沟”，且三面环山，故

其城墙的防洪作用表现得很显著。暖泉城即是北宋泾原路经略使王素、狄青在此所筑的最早的防洪工程。暖泉城内因地势低洼，水患较多。但也因其有暖泉流淌而具有较为温和的小环境，故很早被先民治理疏浚，开发成为游览胜地。左宗棠曾有“平凉高寒，水泉甚冽，此独以暖称，验之，隆冬不冰也”^②之言。此处冬暖夏凉，利于生物繁衍。泾水无鱼，而独以此处鱼鸟翔集，为陇东地区的一片乐土。早在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渭州太守蔡挺便引暖泉为湖，环湖遍植柳树千株，故该湖名为“柳湖”（也有说在唐代已经有了“柳湖”，依据是一些唐宋诗词中有“柳湖”一名）。蔡挺又建避暑阁于其中，成为夏日避暑的好去处，此为柳湖雏形。明嘉靖八年（1529年），韩藩昭

王在柳湖原址“筑墙三仞”，并做了大规模的扩建。《民国平凉县志》与《柳湖书院志》皆载“明嘉靖间，韩昭王以千金筑城三仞。移山川社稷坛于内，以备不虞，砖瓮门二楼，复道相连。亭榭十数，茂林修竹掩映，环以清塘两重，通画舸，植菡萏菱蒲，蓄金鲫鲤，群鸟翱翔，水木之胜，甲于关陇”^③，柳湖成为西北名园。园内主要建筑有迎宾楼、承晖阁、喜雨阁、观澜阁、汇流堂、金鱼堂（中有亭，道以木桥）、夏赏亭、柳湖山（取池中土为山，亭曰四）、龙王潭（暖泉之源，渊深，有巨鱼如牛）等十余处。韩王将这风景如画之处作为王府子弟读书之所。明正德十年（1515年），敕赐“崇文书院”坊额。清初荒废，成为闲田。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知县汪沅开池建亭，月集诸生授课于饮水亭，这便是清代柳湖书院的前身。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知府顾晴沙为兴贤达育才，增建观海堂、深柳读书堂、响鹤山堂、养正轩、上下学舍、时雨亭、青黎阁，定学额40人，录取平凉府士子，始名“百泉书院”，改名“高山书院”，后定名“柳湖书院”。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知府汪皋鹤又重修书院，并募银千两，给典肆收息，以作廩善资金。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知府秦蓉庄和知县龚海峰增修柳湖书院，移校门由南向东，建石桥、牌坊、藏书楼、厅堂学舍。至此，书院规模宏伟壮丽，人才蔚起，科第连绵，可称极盛。嘉庆二年（1797年），知府阎柱峰再次修葺。同治二年（1863年），柳湖书院毁于战火。同

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命平庆泾固化道道员魏光焘修复书院，并亲书“柳湖”匾额。同治末年，柳湖书院更名为五郡诸生肄业所。民国15年（1926年）改为甘肃省第七师范学校。1950年改为平凉师范，1958年平凉师范迁出，改为柳湖公园。

综上，在北宋时期，柳湖就已成为公共园林。明代则变为藩王苑囿和私家书院。清代知府顾晴沙于此设立书院。这个由园林演化而成的书院，屡经重修，将园林与书院一步步紧密的结合起来，从思想和空间层面阐述了“士文化”下中国西北园林书院的特点。

二、柳湖书院的选址和布局

柳湖书院和中国古代其它书院一样，以“鼓舞人才，振兴文运”为目的，以“地灵人杰”的理念及文人对读书环境塑造人格精神的信仰而选址，大多书院都选建在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之处。因柳湖可“揽崆峒之雄秀，顾泾汭之潏洄”，故清代知府顾晴沙选址于此，设立书院。

1. 选址考究

平凉地处陇东，属于黄土高原沟壑区，山大沟深，原残川狭，常年缺水。而柳湖位于暖泉之水的汇聚处，气候温和，草木旺盛，鱼鸟聚集，为平凉自然环境最为优渥之处。北宋时期就已因其良好的小环境而被开发成为公共园林。柳湖书院选址于此，也体现出时人对教育之重视。对其美景《柳湖书院志》便有记载“面山负郭，围以暖泉柳林，其间亭阁楼台挺特错落，池塘桥梁回环

映带。”“生徒吟哦之声不绝。睹斯景也，尘氛尽去，不啻入武陵桃源，别有天地，非人间也”^④。书院可西望崆峒山、太统山，南边有曲水环绕，北边与泾水为邻，前有暖泉潏洄北折，依山环水，形成“仰而望山，俯而窥泉”“泾水峒山在眼前”的环境特点。

在此缺水之处利用如此丰富的水资源营造园林，在此高寒之地利用暖泉来创造更宜居的环境，并建立书院，不可不谓用心良苦。湖光柳色，交相辉映，亭台楼阁，依势而建，每每春暖花开、柳絮飞扬之时，平凉八景之一的“柳湖晴雪”又带动文人思绪，留下了不少诗词歌赋。

柳湖书院具有优美的内部环境，在不少文人题咏中都可窥见一斑。如周维汉《读书平凉柳湖书院》云：“清泉绕楼阁，绿荫护庭院。”王备极《柳湖种莲》云：“杨柳浓荫湖水边，湖中种藕叶田田。”李世男《柳湖春兴》云：“数亩平湖草色齐，望中楼阁影高低”^⑤等。

柳湖书院建于这一既有南国之秀，又具北国之雄的地方，将这种自然之美引入教育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士子，既令其胸怀旷达、心中自有一片清静之地，又使其能体会中国传统山水美学，影响其艺术修养和审美情怀，于寻山问水之间，有所感悟。“湖山秀丽天机活”^⑥，柳湖书院这种营建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士文化”下典型的以自然山水环境影响人的德行品格与追求的思维方式。

2. 布局独到

华夏古典园林以其“虽由人作，宛自天

开”^⑦的诗情画意而著称于世，受我国古典绘画、诗词等艺术的影响颇深，其营造大都由文人直接参与，是“士文化”的典型代表。书院乃士人受教育之处，其与园林的结合，更直观的在思想和空间层面反应了古代文人的思想追求及审美意趣。园林书院较之其他园林而言，营造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大。最显著的则是明确的轴线与灵活布局的同时出现，体现出儒家对“礼”与“乐”的追求。这是一种矛盾，但同时具有微妙的平衡。在柳湖书院中，这一特点表现得极为明显。



柳湖书院创建于乾隆十年（1745年），占地二十五亩多。后经增修，至嘉庆十八年（1813年），其地已至五十亩。书院周围环以墙垣，中为沼泽。建筑主要集中于北侧，南侧以柳湖为主。乾隆年间，主要建筑大多南北向，有庭、文澜桥、观海堂、深柳读书堂、响鹤山房、学舍、时雨亭、饮水亭、养正轩等，建筑环水而建，布局自由灵活。后经屡次修葺，至嘉庆十八年（1813年）其基本格局形成。因原大门位于南边，逼近城

墙，不大便利，故将大门移至东边，形成了更具气魄、直对崆峒的中轴线。大门被水环绕，门后有桥，过桥为牌坊。其北修藏书楼五楹与饮水亭相对，命名为“避暑阁”。牌坊以西为讲堂，讲堂后有荷花塘，整条东西向的轴线直对崆峒山与太统山之间的山谷。轴线从起始处向西至讲堂，建筑物依次排列，直与西边的山谷连接。这种由实到虚的轴线空间变化，使得书院空间既有一气呵成的紧凑，又具有节奏感。轴线两边的建筑物，其布置合形辅势，与所在环境相结合，又都朝向轴线互间形成对话，形散而神不散。轴线北边以建筑为主，且建筑体量较大，最东为避暑阁（即藏书楼），向西依次为时雨亭、学舍、响鹤山房、深柳读书堂、养正轩。建筑密集，主要为院落空间的串联。轴线南边以湖为主，建筑较少，与避暑阁相对为饮水亭，位于水中小岛之上，以桥通向避暑阁，其西面隔水相望的是观海堂，南以文澜桥与庭连接，北以桥与养正轩等建筑组群相连。

除了主要轴线外，书院中的其他建筑亦以可见山光，尤其以崆峒山为美。如《柳湖宴集》中描述书院“横野山为带，连天城作屏。泉光随地绿，树影入潭青”；吴潮《柳湖小酌》云“湖心亭子作宾筵，泾水峒山在眼前”；杨芳灿《柳湖书院即事赋增长句》云“为君敞虚堂，山翠当檐浮”；胡大定《柳湖避暑阁》“峒岭从西拱，泾流向北朝。重楼环碧水，高柳插青霄”^⑧。柳湖书院基于柳湖的秀美风光，北邻泾水，南临城墙，

主要建筑沿中轴线进深布局，正对崆峒与可揽之间。书院内其他亭台楼阁，则沿湖自由布局，蜿蜒曲折，体现园林意趣。

三、柳湖书院所承载的人文内涵

柳湖书院以书院为功能特征，以园林为环境特征，可以说是书院中建筑组群的园林化。从本质上来看，柳湖书院与柳湖园林都统一于“士文化”之下，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培育人才的全面发展。

1. 选址与修养的统一

“先儒往往依山水即间旷以讲学”^⑨，在古代文人看来，人才的培育与其所处环境息息相关，太史公司马迁能写出《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也被认为是其饱览名山大川，采集天地灵秀的结果^⑩。故而书院往往远离城市的喧嚣浮华，选取山水间的名胜之处。利用山水的清淑之气来同化人才，因地之灵秀，造人之俊杰。古代文献对此的记载也屡见不鲜。再以本身小环境的精心营造，达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⑪的境界。利用场所本身及周边环境与人的情感体悟相结合，来影响人的性格、行为乃至梦想与追求。中国古代文人便是利用山水之灵来诱导出人本身的灵气，将人文与景观环境相结合，进一步塑造出身蕴山水之魂、胸怀天下大志的瑰伟之士。这种思想观念对柳湖书院的影响也颇为深刻。柳湖书院位于暖泉城内，并“揽崆峒之雄秀，顾泾汭之潏洄”，而其山川“含灵发秀，蜿蜒磅礴而郁积”^⑫，古人谓“宜有瑰琦伟异之士出其间”。不但创造了良好的书院环境，

且塑造了与国人独有的山水美学一脉相通的书院氛围。因此柳湖书院从清初的“一郡书院”，发展到同治末年的“五郡诸生肄业之所”。书院之中远望崆峒，俯瞰暖泉，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场所，就如明代赵时春《游崆峒记》所述：“崆峒得泾势而愈尊。譬犹正人君子，礼义以峻其防，巍然莫屈。彼淫夫小人，望之而可知其卑且陋”^⑬，朱愉梅有“观海堂前碧流通，遥山仰止有崆峒”^⑭之说；顾晴沙也有“自今以往等斯堂者，可关于泉之水而兴起矣”^⑮的感慨。将自然山水与人文道德观念结合起来，无声的对士子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希望其品德可与山水之德比肩，其内心可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远志向。这种山水与人的关系，即是古人注重“场”之感应的实例之一。这种“场”古时被称为“气”，在此即指书院氛围的形成，即“士子藏修于其中，而后有所屏绝而心常静，有所切而业益精”^⑯之谓。这是古代培养“全人”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这种“场”可分为三个层级——可触、可视、可感。“可触”即是可居可游的生活于其中的具体建筑、园林空间，是最基础的读书环境。“可视”是可以看到的，用以开阔眼界的更大的空间，如书院中可以看到的山峰，楼阁上可以俯视的城池江河。“可感”即是情感体悟，建立在可触、可视空间之上，以生活环境、文化程度等为背景形成的体悟空间。古人不但认识到建筑及其周边环境这些实在之物对人的影响，还注意到了建筑所处的大山水环境乃至人的生活、教育背

景等看似不可触摸之物对人的影响。这与诺伯格·舒尔茨所提出的“场所精神”不谋而合，都认识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

2. 传承与发展的建筑布局

柳湖书院建造时保留其中的历史遗存，而后根据周边山水环境及书院的功能需求排布其余建筑。历史遗存主要为避暑阁、观海堂及饮水亭。“避暑阁”为纪念北宋时太守蔡挺建避暑阁于柳湖的德政，修建于牌坊北侧，命名为“避暑阁”，乃“延宋太守之旧名也”。观海堂之旧基为明代韩藩遗物。而饮水亭则是柳湖书院的前身，“太守（汪沄）造池构亭，月集诸生课文其中”^⑰，“讲学之暇，尝休于亭，掇瓢水煮茗焉”，后人营建柳湖书院，饮水而思源，为感念汪沄，保留此亭，以“饮水”名之。柳湖书院主体建筑东西向中轴线，直对山谷。其余如学舍、响鹤山房、时雨亭等皆环绕轴线布置，形成灵活而有序的园林路径。除此之外，将讲习读书空间与游憩空间及其他空间穿插布置，以讲习读书空间为主，其余空间环绕，有一种寓教于乐的意味。再点缀以花木，使风景严肃而清雅。从上可见，柳湖书院借自然山水提升书院意境，将中国古典园林与书院环境营造相结合，形成具有“天人合一”“寄情山水”“崇尚隐逸”的园林特色书院。

3. 实用而优雅的匾额与楹联

作为华夏传统建筑中的点睛之笔，用概括甚至意象化的语言描述景色、抒发情感、寄托希望，已成为传统建筑中不可或缺的一笔。内容常以描绘景物，启迪情思为主，不

仅起到装饰的作用，也是中国古代“士文化”在建筑、园林中的最直观的体现。其所表现的审美角度和审美方式，是古人审美经验的总结，能给人以启示。书院是士人聚集之所，诗文更能助其深思，进一步形成对园林书院空间的精神构建。柳湖书院中的匾额和楹联，大多是用来勉励士子、劝人勤学的，也有追述古人以为纪念，赞美学习环境，点出选址意义等内容。

匾额。柳湖书院有堂曰“观海”，其意为“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由泉之始达放而之海”^⑧。“养正轩”意为“由童蒙养正归于圣功也”。有“深柳读书堂”，取“四围柳色深，终日读书声”之意等^⑨。

楹联。观海堂有联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勉强学问，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陶冶性情”（毕沅），“涌波千层藻芹竞秀，春生四座桃李争妍”（张博魁）。深柳读书堂联曰“峨冠韩子客，广厦杜陵诗”（顾光旭）。学舍联曰“月到天心风来水面此时不厌百回读，玉蕴山辉珠藏川媚得意深入十日思”（顾光旭）。时雨亭联曰“欲留胜迹前年在，故引清风四面来”（于方颖）。饮水亭联曰“泉石成机趣，文章论性灵；四座清风春荡漾，八窗明月夜玲珑”（陈均）。讲堂联曰“清流急湍映带左右，朝晖夕荫气象万千”（余邦佐）等等^⑩。这些匾额与楹联是情景升华而成，又反过来渗透情景。反应了书院的大环境对题字之人的影响和题字之人对书院和士子的期望，进一步影响后来者，起到了文景交融、文化传承的纽带作用。从此也可以看出书院

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的德行，故不惜选择一郡之胜地来作为书院，用山水之美与德来陶冶士子的性情。

题咏。柳湖题咏之作颇多，这与其中士子的生活不无关系。《秦荣庄先生重修柳湖书院记》中载“录郡秀士者额三十人，延师课之”“常以花晨月夕携僚属与诸生讲学论文焉”^⑪。这为这些题咏的诞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题咏主要以湖光山色、环湖之柳及各个主要建筑为题材。可以想见，其时士子抬头望山、俯首观泉，吟咏唱和于绿水之上、深柳之中，又于其中读书悟道，从而达到身心与自然的统一，精神与山水的契合，昔人与今人思想的交流。除了题咏外，其中还有许多附和前人之作。如王肇衍《观海堂》“古郡开文苑，名泉筑讲堂。瀛洲环几席，蓬岛入宫墙。泾水源流远，峒山气脉长。赋诗歌泮水，今在水中央”；《响鹤山房》“崆峒有元鹤，寄响一何深。春夜闻清唳，山房听远音”；《深柳读书堂》“升堂入室处，深院扫霉苔。柳色千章合，书声两岸来”^⑫等。以士文化为基础营造园林，又在园林中教育培养继承者，生生不息，这种传承正是园林书院最精华的文化内涵。

四、结语

随着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柳湖书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柳湖书院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正式建立书院至民国15年（1926年）改为甘肃省第七师范学校，其办学历史近二百年。惜乎其今已不存，但其营建思想却可为今所用。在柳湖书院基础上改办的陇

东官立中学堂及后来的平凉一中，以另一种途径传承了书院文化，使其发扬光大。作为清代西北书院园林的代表，柳湖书院并非仅因有美景可观而著名，而是因其将书院精神注入美景之中，结合自然山水与人工园林，结合书院的仪式性空间与园林的灵活性布局，将历史遗迹加以保存与再利用，形成具有书院精神的园林空间。并将山水之神引入书院空间中提升其场所精神，使山、水、人、文全部统一于书院当中，融合苦读诗书和寄情山水两种文人精神，共同为培养士子提供积极引导。2007年3月后，平凉市委、市政府在柳湖公园东扩工程中，对柳湖书院进行了恢复性建设。新建的柳湖书院在恢复原貌的基础上，增加了牌坊、大讲堂、大成殿、藏书楼、上学舍、下学舍等曲折的厅堂，古朴风雅，为柳湖公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还是忽略了一些十分珍贵的元素，笔者希望我们在欣赏其美学价值的同时，能够使书院的旧地——今之柳湖公园的潜在作用能够得到重视，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得到挖掘，为拉长平凉文化旅游链条、做大做强平凉文化旅游产业提供智力支撑，并为平凉营建学校、培养人才开拓视野、提供借鉴。

注释：

①④⑨⑫清代朱愉梅：《柳湖书院志》，卷首，序。

②刘兴沛：《民国三十三年平凉县志》，卷四，艺文，左宗棠，《左文襄公宗堂题暖泉》。

③⑪⑮⑱⑲⑳清代朱愉梅：《柳湖书院志》，卷一，建革。

⑤⑥⑧⑭㉑清代朱愉梅：《柳湖书院志》，卷四，题咏。

⑦明代计成：《园冶·园说》。

⑩清代朱愉梅：《柳湖书院志》，卷二，形胜。

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⑬刘兴沛：《民国三十三年平凉县志》，卷四，艺文，（明）赵时春《游崆峒记》。

⑮清代朱愉梅：《柳湖书院志》，卷一，建革，顾晴沙《顾晴沙先生柳湖书院记》。

⑯聂述文：《民国十三年江津县志》，卷八，学校，（清）瞿敬止《育才书院记》。

㉑清代朱愉梅：《柳湖书院志》。

（作者单位：平凉市地方志办公室）

关于二轮志书评审的几点思考

邬 雄

编者按：志书的评审一般需要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道程序。编纂人员根据评审组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志稿进行修改，使其符合《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达到出版要求。笔者就志书评审的重要性、评审的关键内容与重点、评审的过程及需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阐述。

目前，我市第二轮志书编纂接近尾声，结合笔者所参加的二轮志书评审经历，就如何做好志书的评审谈几点思考，以为总结。

一、志书评审的重要性

1. 志书评审是提高志书质量的法定程序

1985年4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1997年5月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二届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都对志书的审稿作出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第467号令，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参审人员、审查重点、审查验收的主体和程序等也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此后几年间，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先后都颁布实施与《地方志工作条例》相配套的规定、办法，明确未经审查验收的志书，不得公开出版。近年来，随着条例、

办法的贯彻实施，各地建立和完善了“法制保障，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编委和地方志部门组织实施”的新体制，真正做到依法修志。在第二轮修志过程中，县级地方志部门都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严格执行与志书相关的条例、规定、办法，依法实行初审、复审、终审定稿制度。

2. 志书评审是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环节

对于县一级志书，审稿者不能离开志稿去空谈，一定要深入下去，对志稿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反复研究和探讨，做好“三审”。

初审。志书初稿完成而尚未送审之前，可以以各种方式进行预审，通常称为初审。其基本做法：承编单位独立编写的篇目，由承编单位进行初审，并根据初审意见进行修改，形成复审稿，加盖承编单位公章，送县级志书编辑部复审。多部门编修的篇目，经

承编单位初审后，交统编单位进行初审，修改并形成复审稿，加盖统编单位公章，送县级志书编辑部复审。

复审。一般指下级交上一级审查的志稿。复审阶段，编辑部对复审稿进行审核，各承编、统编单位根据审核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评审稿。评审稿由责任编辑按所承编目送副主编审核，主编签署意见，加盖公章，报编纂委员会终审。同时，注重邀请专家、教授、学者参加复审。发挥人多智广的作用，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有助于提高志书质量。初审、复审不仅从政治观点、体例、资料、文字等志稿质量方面起到把关作用，而且还能培训和锻炼一批修志专业编纂人员，有助于提高修志人员的业务水平。

终审。终审是志书审查的最后一关。编纂委员会对评审稿进行全面评审，对史实资料有较大补充或重大调整的，由责任编辑会同承编单位完成修改。终审合格后，编纂委员会签署意见，并报县级政府批准，由地方志部门负责出版事宜。志书主编根据终审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做修改、补充，以求达到志稿的齐全和完整。在志稿改定送印之前，仍要进行基本的三次校对。有条件的话，可进行四校、五校。

3. 志书评审是提高志书质量的关键举措

质量是志书的命脉。一部地方志书质量的高低是衡量修志工作好坏的标准。一是在求真上下功夫。志书质量标准的核心是真实准确，这是志书的性质、功能决定的，也是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二是在求精上下功夫。

坚持志稿写作“五要五不要”，即：要观点正确，不要模棱两可；要结构合理，不要随意升格；要特点鲜明，不要舍本求末；要资料翔实，不要材料堆砌；要行文规范，不要随意马虎。

二、志书评审的关键内容与重点

一部志书评审的内容较多，其目的是提高志书的整体质量，因此在承担审稿任务时，必须贯穿解决问题意识，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六个方面：

1. 把握政治观点问题

政治质量是志书的灵魂，它表现在政治性、思想性、政策性、保密性等诸多方面，是衡量志书质量的首要尺度。其中核心问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存真求实。凡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有偏离或抵触的记述，都要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改。

2. 篇目设计划分问题

篇目是体例的核心，是志书的基础。调整篇目结构是审稿者精加工的首要工序。志书所记载的每一事物在划分门类时，必须按同一标准划分。与此同时，归属要得当，要严格遵守“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的原则，分类要科学。如记载机构，同编之中要层次相同，章节统一，不要强分门类 and 事类，即同一范畴、层次的门类、事类已按同一标准划分的，不要插进一个“非类之类”；要坚持“横排竖写”的原则，编排要合理，坚持“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

的排序原则。

3. 资料真实价值问题

志书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可靠的资料固然重要，用以表述资料的语言也必须真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用事实说话，反对空话连篇，华而不实，夸大事实，坚持志书可读性与可信性的统一。而其真实性的考订，首先便是初审。初审不重视，或处理不彻底，留至复审、终审，必然会事倍功半，收效不高。志书资料甄选取舍，就要看有无价值增值，这取决于主编的眼界、胆识和学识，审稿人员要慧眼识荆。

4. 记述要素齐全问题

志稿记述事物基本要素必须完整。记述事件，时间、地点、参与人或群体、事件起因、发展变化、事件结果（结论）要素齐全；记述事物，根据各事物具体特征，构成该事物的基本要素齐全。横不缺项，尤不缺要项，纵不断线，尤不断主线。要求所述事物赓续不断，自然衔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等要素俱全。掐头去尾，支离破碎，体现不了事物发展所固有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为避免内容的重复，可以采取“三对照”的办法，即各“目”本身有关方面的自相对照，有关“目”记述内容的互相对照，各“目”有关内容与概述、大事记、人物的互相对照。通过对照，消灭机械重复。即使是必要的交叉，也应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以不同的记述方法来处理，其中有些完全重复的事物，还可采用参见的方法来处理。这样，就可达到“事可互见，

文无重出”的目的。

5. 加强记述深度问题

志书的记述深度关乎可读性，不应成为审稿“盲区”和“盲点”。对于事物兴起的缘由、时空位置、转折变化的原因、条件和结果，以及事物的性质、状态和规模，当详则详、宜略则略。记述深度要准确把握，深入挖掘资料，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剖析，认识事物的整体面貌和特点；认真选好典型材料，展示事物深层次的内涵；由表及里，揭示事物的本质；纵向贯通，反映事物的兴衰起伏和发展规律；适当横比，反映事物的相互关系。

6. 增强保密意识问题

修志人员要想把涉及全社会各行各业的具体规定都掌握得十分准确是不容易的，需要各有关部门分管领导和撰稿人员的把关配合。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依照程序办事，不能图省事、怕麻烦。要向撰稿单位提出明确的要求，志稿终审前分别交各撰稿单位进行保密审查，并签字盖章。此外，涉及科学技术专利、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产业安全等内容资料，坚决不收入志书。直接或间接的泄密，志书中都不能出现。

三、志书评审的过程

如何搞好志书评审，开好评审会，充分利用评审会卓有成效地提高志书质量，解决修志遇到的难题，结合参加市县志书评审工作的实践，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 博采众长，多角度审稿

对参加评审的专家的选定，应该符合具有权威性，熟悉地情，熟悉志书，各行各业

中具有代表性这一标准。特别是应吸收保密、档案、历史、法律、军事、经济、政治等各界各部门专家，当然更应有熟悉地方志编修的专家从体例和行文规范上把关。这样才能够对各自熟悉的领域提出有针对性的修改建议，便于下一步加工完善。例如《陇南市志》评审会除请省市地方志专家，还邀请了陇南市统计局、陇南军分区、陇南市政府法制办、陇南市保密局、陇南市档案局等有关单位的人员参与评审，收到很好的效果。

2. 政府支持，为下一步志书修改出版打好基础

一般县级志书评审会议，邀请上级修志部门领导，本级行政部门分管领导参会。一是主管领导参会，可以鼓舞士气，体现“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体制，提高修志工作影响力；二是借此汇报修志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修志工作存在的资金、人员诸方面的困难，以取得政府有效支持。

3. 充分讨论，以会代训

除了评审专家、有关领导外，主要的参会人员就是志书编修人员了。一本志书的撰写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不同部门许多人的协同配合。志书的撰稿阶段，各司其事，初稿经主编统纂后，在评审会认真聆听专家提出的意见，有针对性地与专家交流，作好记录，有利于下一步志稿修改工作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在组织召开县志评审会时，还会把其他县级志办主任或负责人，以及一些修志人员召集到一起参会，这样一方面能够借评审会之机，以先进促后进，使修

志进度较慢的县区看到自己的差距，通过取经找到解决当前困难的办法；另一方面借专家当面评稿之机以会代训，培训修志队伍，以利于今后工作，可谓一举两得。

四、志书评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志书评审意见应尽量落到“可操作”上。评审提出的意见，是否能够有效地运用到下一步志稿的修改完善过程中，主要取决于志稿评审意见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1. 评审意见尽量以稿论稿

少说理论，少做空谈，这是有效评审的前提。在评稿过程中，紧紧结合志稿实际，不拔苗助长，更不随意否定。一部至少百万字的县志稿拿出来是相当不易的，凝聚了很多人的辛勤劳动。虽然初稿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可能基础很好，有的也许水平较差，但修志人的初衷必定是想尽其全力修一部可留存后世的志书，受限于修志者自身学识水平或者其他外界因素，志稿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评审志稿的目的就是在志稿现有水平基础上，帮助找出不足，提出解决方法和路径。如果是资料问题，那么指出查找补充资料的方法，甚至可以帮助沟通有关单位提供资料；如果是篇目问题，那么就把具体可调整修改的篇目列出来提供参考。甚至小到某些行文规范问题，直接指出修改方法。评审会上，切忌讲一些泛泛的理论，甚至离题万里，和志稿脱节，使修志人员听得茫然，会后仍无从下手，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2. 评审志稿应首先评其谋篇布局

指出篇目设置、结构层次等方面的问题

题,然后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面到点,环环紧扣,丝丝入微,如庖丁解牛,分析透彻,点拨到位。在实际评稿过程中,无论是看哪一部分内容,有两个必读项:一是凡例,二是全书篇目。凡例,阐明全书宗旨、大纲和概要,拟定志书思想、原则、断限、体例、格局、样式等,虽然文字不多,但作用不可低估;篇目,是志书总体设计蓝图,内容上可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形式上应符合县区志体例,阅之可略知全书体例架构和内容分配。了解了志书的这两部分,才能明白所负责评审的内容在全书中的位置是否合适,编、章、节、目设置是否需要调整或补充完善。

3. 志稿评审和讨论相结合

对志稿的审读过程中,发现问题应及时标注,“不以善小而不为”。同时,边审读边记笔记,随后梳理形成一个书面的评审意见和建议稿,随志稿留给修志人员做会后志书修改的参考。评审会应双向进行,既有发表评审意见的时间,也应留下互动的的时间,解疑释惑,讨论问题。

4. 评审意见的消化吸收

县区志评审会一般为一天,往往时间紧凑,内容繁杂,不可能所有问题都在会上发现和解决。要使评审会开得卓有成效,一方面在于专家评审准备充分,审读认真,给出操作性强的修改意见;另一方面就是县区修志部门要认真听取和收集志稿评审意见和建议,以便于会后讨论。会后要根据专家书面意见和志稿批注,按撰稿分工各自化解,逐

条消化。对评审意见认真梳理,加以分析研究,消灭“硬伤”,补充完善,纠谬改错。遇到有疑问、有争议的问题,应经过开会讨论解决。既要认真对待评审意见,也要注意联系本地实际批判地吸收,不能盲从,机械照搬。此外,评审会后,对于专家意见仍可进行电话、网络交流,甚至可以面对面交流,一次评审,负责到底。

综上,县区志书评审工作是志书审查验收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志书质量的有效方法。通过志书评审,力求使志书内容符合宪法及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规定,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本地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做到政治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风端正、特色突出,这样经过认真修改、补充完善的志稿,经终审后方可送交出版。

(作者单位:陇南市地方志办公室)